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11 月 30 日第 11 期

##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

阅史漫笔

李亚东 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 1960 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蓦然回首

何 蜀 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杨世元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

附录 1962 年春节《重庆日报》副刊约稿信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

杜钧福建议对民间资料的整理提出分类方案

作者黄肇炎来信作一更正

---

【史林一叶】

### 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

杜钧福

文革初期，对各大、中学和文教单位均进驻了工作组。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几天后，他指责这些工作组镇压学生，阻碍运动，令全部撤回。后来按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提法，称这段时间的运动为“五十天”的“白色恐怖”。

以往文革历史研究的弱点是着重上层斗争而忽视群众动态，着重大城市、重点单位而忽视全国基层的普遍情况。对于中学文革的叙述，往往以北京市那些著名学校为例证。那些著名学校确实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但是即使在北京，多数一般学校的文革进程也显著不同于清华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文革初期（以及后来）受苦受难的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仍处于弱势地位，

而主导文革研究的主流意识仍对从事这一最值得尊敬事业的群体所遭受的苦难缺乏足够重视，致使现有文革史中留下若干盲点，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校教师集训就是其一。

1966年7月14日，根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送审稿）》，其中有组织中学教师集训一项。集训的目的和要求是：

“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领导力量集中，工作对象集中，便于更好地交代政策和掌握政策，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有利于左派学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与校之间可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

“集训的要求：一是着重解决各校领导核心的问题，重点批判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是促进大多数干部、教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提高左派师生的思想觉悟，锻炼他们的作战能力。”

北京市的一些中学也根据这一文件在暑期进行了集训。可能与此有关，国内许多地方也在7月份后组织了中小学教师集训。

关于北京市的教师集训情况的材料所见很少，也许它们在北京市的文革史中所占地位不很重要。关于外地教师集训的材料也不多，往往只是在谈论别的问题时顺便提起。例如重庆1966年轰动一时的“八二八”江北事件就与参加集训的教师有关。但是近年来各地均编撰了地方志，有些学校编写了校史或大事记。在这些志书里，均把教师集训当作文革重要事件予以记述，其中有些还比较详细，而且描述比较客观可信，使我们得以较多地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后果。

虽然毛泽东回京并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后，北京等大城市的运动发生了转折，以后又有红卫兵运动等事件发生。但全国基层的运动节奏与此有所不同，其进程不完全符合上述“五十天”模式。实际上，在教师集训结束前，对于全国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都处于文革的第一阶段。它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工作组期，后段为集训期。在这两期里，有四股力量在互动。他们是工作组、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在这四者中，工作组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而教师处于绝对的弱势。在工作组进驻期间，概括地说，就是工作组支持学生整领导和教师，和北京的著名中学一样。但在北京著名中学里，工作组只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一般来说，学校领导并无很大主动权，只有少数情况例外，如文革开始那几天，有的学校领导，主要是党支部，抛出教师档案，企图按照以往运动的经验整老师。还有的领导配合工作组一起整老师，如在北京回民中学就是这样（刘东声《北京回民教育史略》，北京市回民学校，1999）。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起受难。

少数学校在工作组进驻以前就有学生造反，攻击学校领导和教师。工作组进驻以后，多半是支持这些学生的造反行动，两者并无矛盾。在工作组后期，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有学生和老师反抗工作组，但那属于个别行为，和北京著名学校的情况有所区别。

教师集训开始于“五十天”后期，或者说，“五十天”的退却时期。此时，北京的运动重点已经有所转移，工作组已遭遇种种困难。后来，毛泽东批判了工作组，工作组随即撤销。这股风传到各地，各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也很快撤销。但是毛泽东没有批判教师集训会。这是因为，集训会整的是教师，是“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革命学生”。于是，集训会继续照样办下去，有的甚至一直办了几个月，学校领导和老师遭受了长期的更厉害的折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加博弈的四种力量在集训会里只剩两种。学校领导已无任何权威，和普通教师处于同样挨整的地位。只有少数学生，一般是被挑选出来作为革命力量参加老师集训，只能助桀为虐，不可能成为制衡力量。而且，在很多集训会里，除去学生作为“革命动力”，还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使集训会里“火药味更浓”。这些“贫下中农”代表可能有些文化，在集训会里被逮捕、清除的教师的位置就由他们中的人顶替。他们又怎能不积极“干革命”呢？

本文以陕西的地方志、校志、校史大事记等为材料，对该省文革初期的教师集训会情况作一梳理和研究。共查阅该省市、地区和县的相关志书近百种，除极少数县外，都有教师集训的活动记述。引文出处不再具体给出。

## 1，教师集训会的举办

一般来说，教师集训会的举办是按照上级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进行的。例如略阳县委于1966年7月下旬发出《贯彻省地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意见》。其中指出：“县文教体单位是我县这次运动的重点，略阳中学教师和高中生今年不放假，由县委派去的工作组领导搞文化大革命，小学教师利用暑假集训”，县委在《小学教师暑假集训会的安排意见》中说：“学校中绝大多数单位领导权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人物篡夺，是这条黑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所以这一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乃是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论断。

在陕西省，多数地区对于全部中小学教师都举办了集训活动，其中少数地区的教师集训会成立于1966年6月或7月上中旬，大多数成立于7月下旬，少数成立于8月，极少数成立于9月。所以，多数地区的集训会的成立可能受了北京市举办教师集训的影响。

这样的集训会一般以县为单位。处于偏远地区的县，由于人口稀少、文化不发达、教师人数少（几百人到千余人），一般集中在一个地方举办。而大城市如西安、咸阳附近，由于教师人数众多，一般分几个地方，以区为单位举办，或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分别举办。

## 2，组成

几乎都是全体中小学教师和领导人员参加，有领导机关（市县委）派工作组组织领导。此外，还广泛派工人、贫下中农、学生代表参加作为“革命”动力。

例如渭南地区：“7月21-23日地委决定，对初中和初中以下学校2万多教师集中集训，同时派5千多工人、贫下中农、初中学生代表‘协助’。对高中则

派工作组。”

大荔县将全县 2461 名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进行集训，并选派工人 33 人，贫下中农 325 人，学生代表 467 人参加。

府谷县的“小教会”，参加集训的公办教师有 236 人，民办教师 356 人。另有工人代表 7 人，农民代表 26 人，学生代表 20 人，共 645 人，划为 18 个小组。县委派出 35 人的工作组全权领导。工作组内又组建了“审干委员会”，以随时审查参加“集训会”的任何人。

神木县的中小学公、民办教师集训会，县委派工作组领导。参加集训会的有公办、民办教师 1022 人，干部 60 人，贫下中农代表 45 人，学生代表 53 人，共 1180 人，分 30 个小组进行。

这批“积极分子”参加进去干什么？非常明确：太白县委“相继选派 20 名贫下中农积极分子、66 名学生代表进驻‘集训会’参与批斗教师活动。”

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积极呢？首先，“一大批左派却因此被提拔或吸收入党。”（府谷县）其次，在乾县，集训会期间有 120 多人被开除公职，占受批判教师数的 30%。“同时，从参加集训会的农村积极分子中吸收公办教师 100 多名。”

### 3，过程

以礼泉县为例：“教师集训会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放手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揭露问题；第二阶段，组织左派队伍，开展思想批判，解放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第三阶段，集中开展对敌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狠、斗准、击中要害；第四阶段，整顿组织，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处理一大批’，‘选拔一大批’。”

一开始是揭发阶段，普遍开花，大部分教师受到攻击。例如在子洲县有 1032 名教师参加集训，在集训会上张贴大字报 10440 张，涉及 558 人。在长安县“全县 10 所初中 450 名教职员参加的集训会，长达 57 天，并有学生代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火药味甚浓。会上共贴出大字报 45600 多张，揭出 23500 余件所谓问题，揪出所谓反革命和有‘反动言行’的 238 人。”

在第二阶段，即对参加人员进行分类排队。所根据的，主要是人事档案和揭发出来的“问题”。按照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则，一般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三类是有问题的，四类是问题严重的，三四类属于批斗对象。四类一般保持在 10% 以下，而三类为百分之十几，二类合计 20% 左右。但是各地区掌握有所不同，如以下三个县的数据。

县	名称	日期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府谷	小教会	8，3-11，3	27.4%	43.9%	21%	7.6%
三原	集训会	7，28-9 月中			13.4%	7.5%
神木	集训会	7 月-	38.16%	49.1%	8.61%	4.1%

进入第三阶段，就该批斗三四类人物了。第四阶段主要是组织处理。

#### 4，受难者

在教师集训会上，什么人的什么问题被揭发批判呢？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揭发的问题分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一般先历史后现行。历史问题可以从查档案入手。

所谓历史问题包含极广。“凡出身为地主、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市民或旧社会当过职员、店员的教师，人人过关。”（白河县）“解放前上过中小学的教师被强令交待什么‘历史问题’，出身为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被当作什么‘孝子贤孙’批判，一些历史问题本来查清并作过结论的教师，被作为‘反革命’斗争。”（千阳县）

其次追“现行”问题：“在教师，学生中摸底排队，号召‘要筛子筛，筛子筛’，从对学生作业批改、笔记记录中查找教师的‘问题’线索”。（白水县）“一些中、小学校长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黑帮分子；一些学有专长、教学有方的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有历史问题、错误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师，被视为牛鬼蛇神，进行大、小会批斗。”（高陵县）

“把一些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而学有专长的业务骨干和威望较高的干部和教师，一律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批斗。大造‘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有名气越修正’的谬论。”甚而至于“爱好花木虫鸟、生活方式比较讲究的人，都统统定为‘牛鬼蛇神’”。（兰田县）

这样一来，大多数教师陷入罗网之中。

#### 5，迫害方式

在这些集训会里，不但继承传统政治运动的“对敌斗争”手段，而且在后期受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对被批斗者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将人性恶的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白河县：“先是大字报围攻，再小会、大会轮番批斗，由口诛笔伐‘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站板凳、戴高帽、挂黑牌、抹黑手、涂黑脸、揪头发、戳脸、打耳光、卡脖子、揪耳朵、陪斗碰头、罚跪晒太阳、淋雨、皮鞋踢等等。有的人受辱、被打，忍受不了投河自尽。”

在长安县：“集训中揪斗 52 人，被揪教师白天轮番挨斗，晚上还被拉到宿舍外边游斗，还要发出‘牛鬼蛇神’的怪叫声，叫得不像还得挨打。一次批斗，台上放着桌子，桌子上放着凳子，被批斗的某校长被推到凳子上，头顶用若干个废纸篓糊的帽子，帽底放三块砖，帽尖顶房顶，一动不许动。”

在靖边县：“更有甚者，在一次‘黑帮’游街中，给一些‘黑帮’分子戴上驴头、狗头面具，强令其学驴叫、犬吠，人身污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兴平县文教局长高忠仕（兴平地下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等），因遭受诬陷，不堪忍受摧残于 8 月 24 日服毒自杀，事后还召开声讨会，给戴上

“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6月18日，宝鸡市斗鸡中学青年教师张升华触电自杀。张死后，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开除其公职及工会会籍，并声讨其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罪行”，还举办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升华畏罪自杀罪证展览”。

绝大部分县志记载了集训期间教师的自杀事件，咸阳地区自杀18人。宝鸡地区自杀7人。全省在此期间自杀身亡的教师数目肯定在百人以上，如果连同工作组期间，可能达数百人。

## 6，处理

在集训会的第四阶段，“一大批”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在彬县，参加集训的全县中小学教师945人中，有200余名教师被围攻、批斗，119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坏分子，其中2名被逼自杀，1名失踪，62名被开除公职，13名受到开除留用处分，10名临时工被处理回家。

在高陵县，全县中小学教职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斗，325人长期被审查，121人被清出教师队伍。

在旬邑县，全县举办810人参加的70多天教师集训会，有111名教师受到批判斗争，41人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而开除公职，2人被迫自杀，1人跳崖致残。

在眉县，县委举办913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的集训会，100余名教师受到批判，其中16名被开除公职，16名被逮捕，8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在陇县，县委举办945人参加的全县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被揪出进行批斗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15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处理的156人，其中开除公职、开除留用的93人。

在蓝田县，全县中小学教师2024人，被整1621人，受处分或长期审查的427人。其中被开除公职267人，法办21人，受迫害自杀6人。孟村中学有教师42人，被打成“牛鬼蛇神”25人，占教师总数的59.5%(其中逮捕3名，开除11名，准备逮捕7名)。

综上所述，在很多县里，被开除、劝退而清除出教师队伍的达百分之十左右，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受到逮捕等“法律处理”。

## 7，从集训会到集训队

教师集训会一般结束于红卫兵运动阶段，少数结束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历时一个半月到三个月，极少数达半年。有的是按照计划自行结束的，有的是在外界冲击下被迫结束的。多数教师暂时脱离了苦海，但是仍有少数教师陷入更悲惨的境地。他们是三四类教师或有问题未查清者，多为骨干教师，被留下继续“整训”或“集训”，均被视为“黑帮”或“牛鬼蛇神”而从事艰苦劳动或被批斗。其组织形式有不同名称，现统称为集训队。

例如在白河县，“留县整训的几十名‘黑帮分子’，集中在县文化馆一边交待‘问题’，一边劳动改造，挖土抬石，修建体育场司令台。10月10日，县委通

知把留训的‘黑帮’教师分散到大双公社花湾大队、仓上公社红花大队、卡子公社红旗大队‘劳动改造’。凌晨，自背行李徒步出发。‘黑帮’教师走到哪里，批斗到哪里，到卡子的20人还没有顾上吃饭，就接受当地的‘下马威批斗会’。各人自报姓名，双手高举，头要低下，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竹棍、木棒、柳条来回抽打，边打边骂，有人别出心裁，拉出几个‘黑帮’教师跪在马路中间，令举起手低着头，面前点盏煤油灯接受烟熏。有的女教师连不满周岁的孩子也不让抱，放在地上也得高举双手。”

白水縣教師集訓隊設立於中小學教師學習會9月2日結束之時，解散於1967年元月2日，歷時4個月。地址先設在新興路縣劇院窩內，秋收後搬至白水中學西側盲流人口收容站，縣委派工作組負責管理，被“集訓”教師幹部共109人（其中行政幹部4人）。“集訓”期間，無人身自由，家屬探望送物要檢查，上廁所要報告，白天勞動，晚上寫檢查交代材料。“集訓”中罰以重體力勞動，當時6個人拉1輛架子車，裝800多斤石頭，從縣西河溝底拉上坡，到縣城南門外卸于粉碎場，全長約4華里；1輛車有1名“紅衛兵”跟押，上坡時還要勒令趕超畜力馬車，個個疲累不堪。這樣笨重的勞動，持續約兩三個月。教師趙金倉（家庭地主成份），因“歷史問題”，加之身體瘦弱，不堪其辱，一日夜晚服毒自殺。

## 8，對社會各界的影響

在許多地方，文革初期的教師集訓會作為搞運動的樣板，領導部門試圖將這樣的組織形式和做法推廣到其它各界。例如在延安縣：“9月初，集訓教師全處於揪斗高潮時，延安縣委、縣人委決定召開縣、社兩級幹部會。會址選在馬家灣的第四中學，並學習集訓教師的做法，黨政幹部人心惶惶。後因‘紅衛兵’大串聯的衝擊而結束。”

在宜川縣：“並將‘教師會’的做法推廣全縣。揭發批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使用掛牌子、戴紙帽子、跪凳子、游街、游村、強行體力勞動、刑訊逼供等形式進行人身侮辱和摧殘。”

在白河縣：“8、9兩月，整訓會上的公、民办教師已不能隨便走出中學大門，更不准請假回家。‘教師里出了大批黑幫分子’的傳聞和詳細批鬥情況早已傳遍全縣城鄉。當時，縣上各單位和農村生產隊也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鬥會遍及全縣。”

## 9，和紅衛兵運動的互動

1966年8月份，紅衛兵運動在北京興起並達到高潮，迅速發展到全國。紅衛兵運動的內涵比較複雜，從初期的“破四舊”、整五類分子和知識階層發展到衝擊各級領導機關，所以對教師集訓會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紅衛兵在校园里殴打教师的暴行被教师集训会学了去，例如在府谷县：“8月下旬，会上的‘左’派，从府中‘红卫兵’那里学来推花头、站板凳、抹黑脸、挂纸牌、戴纸帽、罚跪、‘坐喷气式飞机’、敲锣串院、上街游斗等多种侮辱人身

的做法批斗‘三、四类’人。”在武功县，一些中学生于9月5日赴教师集训会揪斗被点名的教师，与教师发生冲突，未遂而撤回。

但是，当北京和当地的红卫兵宣传“造反有理”，炮轰领导机关时，教师集训会的领导就组织教师围攻这些红卫兵了。例如“8月中旬，首都‘红卫兵’和西安交大学生来乾县‘煽风点火’，教师集训会立即组织教师围攻学生。8月25日，乾县师范、乾县一中学生走上街头，传抄中央领导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张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轰乾县县委’等大字报。中共乾县县委对迅猛发展的形势束手无策。8月28日晚，县城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和群众冲突的事件，上街宣传‘造反’的学生遭到群众和正在搞集训教师的围斗。”8月14-15日在户县也发生类似事件。这些事件类似于8月28日在重庆江北大发生的“八二八”事件。对于在“八二八”事件中参与围攻造反学生的集训教师的境遇和心态，何蜀先生在《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分析：“教师们普遍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以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来了，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他们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保卫党组织’的决心。”（见该书第25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

当然，另一方面，红卫兵运动也冲击了教师集训会。不是所有参加集训的教师都甘于被驱使与学生作对，而且学生的造反行动可能启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于是，“学生的造反运动，冲击了教师集训会，为稳定集训会秩序，进一步加强了对揭批对象的管理和批判，围斗、轰打手段更加残酷。”（乾县）

当时不少地区的领导为保自身，动员组织工人农民围攻造反学生。陕西省在这方面很突出。但是我们注意到还存在另一种工人对学生“造反”的干涉，如在长安县：“韦曲一中从校长到教职工22人被打成‘黑帮’和‘反革命’，被驱赶在38℃的高温下跪在露天讲台边晒太阳。有的学生还给他们头上浇墨水，给身上贴大字报。‘造反’学生押着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拴着一摞砖的校长和被驾成‘喷气式’的‘黑帮’教师在校园内游斗。县财贸、工交系统干部和工人300余人看不惯这种做法，拿着榔头、钳子到韦曲一中、长安师范表示反对，工交局副局长因此被打成‘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 10，集训的最终结束

1966年10月以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一些尚在进行的集训会被迫解散。但是地方上的运动开展滞后，一些集训会特别是集训队，直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才解散。

在澄城县，“集训会结束后，又留下一批‘问题严重’者组成集训队继续集训。被集训教师无人身自由，家属探望送物要检查，上厕所要‘报告’，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加班写检查交代材料。为了安全防范，集训队还日夜组织站岗放哨。10月，从北京传来反工作组的消息，说派工作组和办教师集训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底集训队被迫解散。1967年2月12日，中共澄城县委成立教师集训会平反小组，开始为部分受批斗的教师平反，并销毁了集训期间所整理的材



料。”

在定边县，“集训会于11月中旬草草收场，36名教师被关进‘牛棚’（集中住宿集体劳动，限制自由），强制劳动改造。不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牛鬼蛇神’们自行解散。次年初，县委在北大操场当众烧毁了整教师的‘黑材料’，县委在人民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冯怀亮代表县委做了检讨，宣布对批斗和处理的教师、学生全部‘平反’”。

在府谷县，“本来10月上旬，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即平反文件）已下达县一级党委。当时县委不仅没有按这一文件精神立即给受害者平反，反而变本加厉地整所谓‘三、四类’人。‘小教会’后又采取了观望、拖延态度，直到此项工作全国各地基本结束，才于1967年2月底召开了小学教师平反会。3月7日，由县委书记和原‘小教会’的工作组长，在县城体育场当众宣布：原定‘三、四类’教师一律无效；所形成材料当即焚毁；在‘小教会’上提拔、调动的教师各自恢复原职回原单位。但对小学教导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认为是‘当权派’，只取消定性，将大字报底稿、‘揭发检举’材料，‘外调证明’等交单位‘革命造反派’，个人检查交本人。因未给予彻底的平反，结果回校后，再次受到揪斗，致1人死亡，多人受害。”

在一些县里，直到被迫害的教师起来造反，集训队才宣告结束或为被迫害教师平反。例如在宁强县，“12月7日，受外地来宁串联的红卫兵冲击，被集训的58名教师起来造反，成立‘12·7’战斗队，集训会方告结束。”在岚皋县，“直到1967年3月，受害教师周泉成等3人赴京告状后，才为暑期教师集训会挨整教师平反。”许多在教师集训会中受到迫害的教师在平反后参加了造反派。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笔者是亲历者。所说的政治迫害，也不过十几天的工夫。真正受到严重摧残的，是那些经历了教师集训会或集训队的，本应受到社会最大尊敬的城乡广大普通中小学教师。可以将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初到1967年初的阶段分为工作组、红卫兵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四个时期，那么遍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集训活动在时间上的跨度如上图所示。也就是说，尽管在主要城市，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反复，但是在这很长的时期里，全国百万以上的教师处在轮回之外，遭受的苦难依旧，且较工作组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大约占总数10-20%的部分骨干教师，遭受长达半年的更残酷的迫害。而且在这之后，广大中小学教师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陷入了更大的劫难。尽管他们可能仍不属于林达所说的“犹太人群体”，但庶几近之。即使今日，他们所受苦难被漠视的程度，也庶几近之。

虽说一般都同意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但是目前对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却有很大分歧甚至对立。即使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也有人认为有积极的方面。对于运动初期向文教单位派遣工作组一事，更是众说纷纭，不少研究者强调应“全面”予以评价。在许多近年来各地编辑的地方志和校史中，绝大多数对其是否定的，也有少数材料认为工作组起稳定局面作用。但是唯独文革初期的教师集训活动，我所见材料均一致予以强烈谴责，无人为其辩护，可以说达到社会共识。本文所引主要资料来自官方编纂的陕西地方志，反映了当前基层执政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立场与其它材料并无二致。

---

【阅史漫笔】

## 查勘地下文学现场

### ——从 1960 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李亚东

按：本文原发表于《良友》第 12 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7），发表时有删节，题名为《地下文学现场中的“诗魂”》，本刊现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文章完整版。

作者李亚东，1962 年生于甘肃甘谷。先后就读于西北师大、四川师大。当过中学教师、文物干事、报刊编辑、BBS 版主。现在四川师大文学院教中国当代文学。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

独立的“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资料的不足。以至于北大的洪子诚先生一再兴叹：“史实、材料的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当代文学的许多材料被垄断，当代文学还怎么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和这个情况有关。”主流的研究尚且如此，异端的建构自然就更艰难了。

所以，有些研究者停步不前了。就像洪先生所坦白的：对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文学，就算有寻找“异端”的冲动，可“你不能不信，但又放心不下”，事情大概如此。他写了篇《文学作品的年代》，一股脑提了三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可否按照公开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确定作品的年代？二是，在标示的写作时间到发表的时间之间，作品是否有改写、变动？如作过重要修改，能不能把写作时间完全确定在所标示的时间上？三是，假如写出作品未被阅读，作品只是手稿之类，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视为那一时期的“文学构成”？或者说，它还是“文学事实”吗？

对于这样三项质疑，我想研究者应该回应。我肯定相信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和美学有效性。文学作为人类的梦想，任何时候都不会绝灭。我们知道，连奥斯维辛集中营都有诗歌、绘画留下来；古今中外的秦皇如何不可一世，终究“人

间犹有铁未销”。话是这样讲，不能把推理当事实。学术研究不仅要有理论前提，历史讨论更要“拿证据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疑的，不能不先“辨”个清楚。就像上海地下文学的参与者陈建华所感叹的：……诗是一回事，写诗的历史是一回事，得遵守历史学的游戏规则。“其实我自己在这一行里讨生活，论及作家求诸史料考证，却没想到自己的诗也要办‘历史’手续。”当然是那么回事。不论任何时候，都有个“辨伪”问题。正如“七月派”老诗人冀汭心直口快所讲：“……在什么都有假，什么假都有人敢于制造的今天，也免不了会有假‘潜在写作’。”

因此很长时间，对于“地下文学”的材料，我喜欢看却也保持着矜持。你不能消除头脑里的问号。

直到几年前，为了参编一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为了自己承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章节的写作、修订，专程深入到成都市档案馆，翻阅那些发黄的卷宗，见到了1970年本地诗人蔡楚被列入“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时的“交代”、“审讯记录”等，大量涉及“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此次“田野调查”基本消除了我的疑虑，而对“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不再怀疑。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跟人分享、讨论。

蔡楚（本名蔡天一）先生的有关档案编号：145—1468—1272。以专业眼光看，1970年的“反动诗”档案，不仅是他本人1960年代从事独立写作的一份有力而真实的证词，对于后人走近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地下文学现场，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 一、文本

从1970年1月12日到6月13日，25岁的青年蔡楚仅个人“交代”，就写了39篇。能够落实的罪状，也就“写反动诗”、“偷听敌台”两项，主要是前者。由于档案不能复印，我做了许多笔记。其中2月3日交代，是此前写的反动诗。3月12日作了补充交代。下面是2月3日“交代”全文。为保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尽量原文照录。个别不好认的字词和标点，也照猫画虎。办案人员所加的符号、横线，一并保留并说明。它能帮助我们做些判断。

###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6年，文化革命初期我向工作组，把我所写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作了交代，现交代如下：

《赠某君》（指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62年时在成都16中读书）

看到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  
却似激荡的迴水，  
记忆从我心中流过。  
可曾记得那油光的书桌  
明亮的教室里坐着你我，  
两年的携手并进、  
给我们结下了一棵友谊的硕果。  
而今你在灯下攻书，  
我却只能站在凄清的河边，  
眼望着滚滚东逝的流水，  
叹息人生青春的蹉跎。  
看到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  
你可知道在我心中升起了多少憧憬？  
升起了多少寂寞！

#### 《给你》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绵长晶莹的柔波，  
把我的心儿紧系。  
那明星伴著媚月，  
究竟是天经还是地义。  
为什么在这寂寞的时儿，  
我就想起了您？  
想起了你，  
夜色更加沉寂。  
沉寂中不见你天真的面容，  
不见你我感到窒息的哽噎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不，不是柔波把我心儿紧系，  
明月下久忆你深情的黑眸。

####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小妹垂手睁着眼睛，  
弟弟悄声问我：“你还回来吗？”  
走出这可怜的家，  
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  
你的儿子到社会去了，  
我会为人民辛勤劳动——对你作最大的报答。  
脚踏在兰天的祥云下，  
浮想又象云片似飘达  
多么想看落叶的飘飘，听西风的飒飒，  
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只因为旭日挥手向我示意，  
我迈步奔往那希望的朝霞。

#### 《乞丐》△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褴褛的衣襟遮不住小小的过失，  
人们骂他、揍他却不知道他的悲哀，  
自从田园荒芜后……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褴褛的衣襟、颤抖的手、人们瞥见就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冬夜里朔风怒吼，  
可怜的乞丐下身挂着几片遮羞布，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他等待着呵，蜷伏着，他在等待。

#### 《无题》

梦里常萦系一张笑脸，

萦系着美丽的过往，纯洁的初恋。  
友人们常说是应当珍惜，  
在这寂寞的夜晚和白天。  
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个花环，  
会题上我痛绝的追忆，忘情的冷淡——  
心温柔地腾跳，  
当我们十七岁那年。

交代人  
土建中队  
蔡天一  
70年 3/2

大概2月3日不能算完，3月12日又补充了一首：

……到大邑后，我还为孙从轩歌功颂德，写了一首诗来美化他，这首诗如下：

悼

——写在一个骨灰盒上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全部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静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用斗争去迎接生活，  
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

## 二、自述

除了“反动诗”文本外，蔡楚还写了大量交代，“说清”每首诗的写作过程、背景及立意，乃至自己的诗歌写作路数。当然，未必就那么毫无保留；在那种情况下，肯定要自污、狡狴或言不由衷。但是可以想像，想侥幸过关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来看，不妨说是一个写作者在特殊环境、特别条件下写的另类“写作谈”。

有关内容，主要在3月8日、3月12日、5月6日、5月12日、6月13日的“交代”里。应该说这些交代，比较全面、也不无重点地“说清”了他及“反动诗”的各方面。——应该说明，有时相当不厌其烦：

3月8日的交代，围绕2月3日的几首诗。从交代的顺序看，似以《乞丐》、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为重点，《乞丐》为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这首诗处，专案人员在下面划了横线：

62年至64年，我写的反动诗，其中尤以《乞丐》一首最反动。我当时受反动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要写所谓的“生活真实”。加上自己的反动本质，就认为街上的《乞丐》是社会造成的，我在这首反动诗中反复强调“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说明《乞丐》本身可以靠双手劳动，而却落得田园荒芜、流落街头。我这首诗大约是63年初写的，这首反动诗、恶毒地攻击了新社会，起到了为帝修反摇旗呐喊的作用，这是我的罪恶。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我63年8月调成都砖瓦厂前写的，当时我一心想读大学不成，我反动父亲又给我灌输华罗庚、何其芳都没有正式进大学，靠自己苦攻、自修、成了数学家、文学家的，我反动父亲还谈到他也是每天吃锅魁进图书馆自修后来考取学校才有了前途的。在那段期间我天天到图书馆自修，想个人奋斗，将来成个诗人、文学家，但家中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不工作，我母亲每天都同我吵闹，要我去工作，不然就要我离开家，不供养我了。我没有办法，到办事处要求做临工，63年8月调我到砖瓦一厂做临工。我由于日夜攻书，身体很弱，并感到天天在家吃受气饭，现在能离开家，踏入社会工作了，于是写了《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这首反动诗。我把自己比作憔悴的花，把家说成可怜的，这都是反动的。

《赠某君》，蔡楚说是写给初中一位同学的，后来听说考取了四川外语学院。“我这首诗也是反动的，认为自己青春蹉跎了，光阴虚度了，（初中时学过《明日歌》）抒发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苦闷、寂寞的感情。这首反动诗是62年写的。”《无题》是64年写的，《给你》是62年写的，都是写给当时女朋友詹××的，因对方家中不同意断了来往，“事后我病了两个星期，好了之后很后悔，就写了《无题》这首反动诗，在诗中我自感寂寞，把白天和夜晚都说成是寂寞的，这是很反动的。”

3月12日这天，蔡楚提交了两篇，一篇围绕《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一篇反省写作道路和所受影响。现摘要如下：

……我写这首诗，是说孙从轩死了，装在骨灰盒里，骨灰盒的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孙从轩生前的一切都随着他的死而过去了。但是孙从轩的精神是不死的，马克思说过“生活就是斗争”。孙从轩生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极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而在我们的生活中积极参加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就会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生活就会像一匹被驯服的骏马一样，载着我们奔向共产主义。我写这首诗美化了孙从轩，也美化了我自己，……由于我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所以就搞不好革命，对谢朝崧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不敢揭发（虽然我说过他们那样作

不对),怕揭发出来触及自己过去的罪恶,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而对自己过去没有牵连的人我就揭发了、上纲了,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却不交代,我这样的革命是假的、反革命的,一遇风浪,我也就可能为了个人的前途而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我诚恳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老老实实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改造,重新做人。

关于写作道路、所受影响,大概是追问的重点。3月12号、5月6号、5月12号、6月13号几天交代,都围绕着它。3月12日写:

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我认识到自己爱好的文学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自己所写的诗是为帝修反服务的反动诗。在我62年进图书馆自修那段时间,谢朝崧给我介绍了五四运动时的诗人及作品,特别是反动诗人戴望舒的作品《戴望舒诗选》,谢朝崧介绍说写诗首先要懂得音韵的美,其次要懂得意境的深远。由于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共鸣,我看了这个反动诗选,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确实写得好,念起来音韵铿锵,体会起来感情深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感情),我于是就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如“看见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是模仿戴的“看到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写成的,逐步使自己堕入了反革命的泥坑,写出了反动诗篇。除了自己到图书馆去自修外,谢朝崧还借了许多修正主义的书籍给我看,我自己受毒很深,一心要想成为中国新诗坛上的一颗巨星。在解放后的诗选中我又喜爱看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选。虽然我也写过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诗,但这种感情不是真实的,总认为我写的反动诗才是艺术价值最高的诗,……我所写的歌颂孙从轩的诗,一方面美化孙从轩、美化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采取的文学形式也是资产阶级的音韵和谐,我自己认为我这首诗,政治性同艺术性都很好,而用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检验我这首诗也是一钱不值的,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现在认识起来,我写这首诗头一段词汇消极,整个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态度不鲜明,歌颂的对象并不是完美的无产阶级的形象,而是站在私人的感情上来加以美化,也是非常错误的。

5月6日,专门检讨《乞丐》,自污中委婉自辩:

62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当时我思想上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要写生活的真实,要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国家遭受到暂时困难。我在街上(东大街)买包子吃被抢走了。我的思想上想,为什么街上会出现抢东西的乞丐呢?我想在学校里时政治老师教我们说:“人定胜天”。政治老师还说:“到1962年,我国的生活水平,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达到每人每天有半斤肉、半斤糖,和饭后水果等。”我想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为什么反



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当时国家遭受到三年自然灾害、遭到暂时困难，我想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理由不通，因为人是能够战胜困难、改造自然的，不应当把困难的原因归于自然灾害，而应当检查一下，我们在农业问题上是否犯有错误，是否真正用我们的双手去战胜困难。我从思想上就怀疑党在农业问题是否犯了政策上的错误，而走了弯路。1961年，我在工农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全校同学一道到龙泉驿的八一生产队去支援劳动过半年多，看到了农业战线上这个生产队的欠收情况和当时社员的生活困难情况，而我从报上看到的农业战线的消息，却说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我想亩产几万斤，每亩才60平方丈：怎么可能？因此我就认为，这是浮夸的，因此就产生了街上出现乞丐，不是自然灾害造成，而是人为的。而是我们在农业问题上走了弯路而造成的这个反动结论，这样下去就不得了。我在反动诗《乞丐》中用文学的手法，把乞丐描写得十分可怜，因为田园荒芜、而流落街头，出于为了生活被迫去抢几个饼子，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表示了自己对乞丐的同情，并指出“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企图说明人本身可以用劳动去创造世界的，乞丐是无罪的，他在饥饿与寒冷中等待着党和政府迅速改变农业上的状况，使乞丐能用自己的双手，使自己自食其力，这样我就反动地把乞丐出现的原因归到了社会，归到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犯了政策错误。恶毒地攻击了新社会和伟大的党。当时对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是弄不清楚的。……

5月12日，全面检讨“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按照那时的“检讨”八股，无非从两个方面：一是反动阶级根源，一是接触的人、读的书、受的影响等。现摘要如下：

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从自己的反动阶级根源来检查，我父亲在旧社会、是反动的军校教官，是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老爷，虽然他与当时的反动统治有狗咬狗的矛盾，也对我们谈过蒋匪帮的反动腐败，但解放后，他对党和人民政府，仍然是不满的，认为没有重用他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动家庭，从小就给我们灌输，知识是万能的，要苦读书，将来成名成家、光宗耀祖，他的反动思想又是很矛盾的，是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和读书无用同出一辙的。60年以后他探亲回家，又教我们将来不要去爱好文学艺术，凡是与政治有关的工作都很危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最好是学一门技术，当工人、农民一辈子安安稳稳、毫无忧郁。……那段时间，我对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站在同一反动立场上，对他十分同情和崇拜。他自我吹嘘、满腹经纶、一肚子诗书，年轻时能背诵一千多首唐诗、宋词等，现在也能背几百首，每次写信回家不是语云，就是子曰。他既十分自负、猖妄，又非常自悲，以为他大材小用了。而我则继承了他的反动劣根性，对他同情，对自己也感到成绩好、有天才，就是出身不好，就考不起学校，在自修的个人奋斗中十分苦闷寂寞，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站在我反动家庭与个人前途的反动立场上必然地就产生了对党的政策的不满和怀疑，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就产生了反动的结论。所以我会写出反动诗。

另一方面，从我当时、接触的人、读的书、接受的影响来看。我所接触的人是谢朝崧这一类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岁便能写出好诗来，……当时我到省图书馆看了不少五四时代资产阶级作家的诗文选。如：闻一多诗文选、蒋光慈诗文选、冯至诗文选、王统照诗文选、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郭沫若的诗选“女神”，何其芳的诗歌选“预言”等，还看了许多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普希金诗集，莱蒙托夫诗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泰戈尔诗选。等等（也看过一些较好的书，如鲁迅先生的文选）。但由于我的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所以接受了许多修正主义的毒素，成为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通过同志们对我的批判，我充分认识到，我收听敌台，就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行，我写出的反动诗，就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诗。

### 三、场景

加上这一节，我有点犹豫。没有征求蔡楚本人意见，把他“交代”（注意非“揭发”，文体有所区别）与文学领路人谢朝崧“接触”、来往的内容予以披露，会不会对他造成某种伤害？却又不想割爱。毕竟这个文本太珍贵了！近年来，关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之类，人们写了许多，我们也读了许多。可那都是时过境迁，才写出来发表的。而6月13日交代，属于原生态、现场报道。

我想，假如超脱一点的话，则它不止属于当事人，也属于庄严时代，属于历史文献。——写好了呈蔡楚审阅，他如不同意再删？

###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交待

我与谢朝崧接触得较多的时间是62年至65年那段时间，65年8月我参加石油会战后，只是我因事回家才同谢接触。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我接受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同人生观的影响较深，文化革命中又不能主动划清界限，所以他叫我去吃茶、吃饭我也就去了。谢朝崧借过一本《戴望舒诗选》给我看，戴望舒是五四时代后期的所谓“现代派”的作家，这书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的前面还有吹捧戴望舒是爱国的坐过日本人的监狱的序言。而从现在来看，戴望舒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悲观丧气、怨天尤人的反动作品，并不能在当时的青年中起进步作用。我自己在国家困难时期看了这本诗，在自己个人主义的心灵中引起共鸣。当时的我，也是悲观丧气、无病呻吟的。因此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作。谢朝崧崇拜“唯美派”的诗人，他对我也介绍这一类的诗，我当时年轻，渴求知识，听他对我讲这些诗，觉得很新奇、很美。慢慢也就成了这些反动诗人

的崇拜者。谢朝崧说过：“写诗要音韵铿锵、和谐的美。意境要深远，要余味深长，做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谢朝崧对我介绍五四时期的诗人及作品。其中他吹捧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是三大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黄浦江上”、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何其芳的“花环”是五四以来写得最好最美的诗。因为这些诗百看不厌，能够流传百世。他在艺术上追求的是“唯美”、在政治思想上是追求超阶级的爱同美，吹嘘超阶级的“人性”及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这一套资产阶级文艺观。谢曾说过：“胡适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青年中影响是很大的”。他根本不看作哪个阶级服务、追求超阶级的“真、善、美”，我中他的思想的毒害，也是较深的。

谢经常评论中国作家、及外国作家的作品。说什么，托尔斯泰是世界的良心，泰戈尔的诗作表现了最深沉的母亲的爱。而“五四”时期的谢冰心，就是中国的泰戈尔。同谢接触的尹金芳等更比他高出一筹，看过的这类书更多。在谈论起这类作家及作品时更是口若悬河。

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对照，谢朝崧等人对我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观。我自己接受了这些毒害、写反动诗，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

在人生观上，谢对我宣扬“只要能写出一本成功的书、或诗选，就能成名，成名后就吃得开了。有些作家出名是因为一本书写得好，其它的作品并不怎样，因为成名了，打个屁都是香的”。还宣扬：“写出一本好的作品可以得到很多稿费、甚至上万元，这样既有名誉、地位，又能进一步深造学习了。”我即努力自修，希望自己能在新诗坛上成名成家。

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危险的，堕落下去，一定成为一个道地的反革命，我决心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讲话》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使自己能重新做人。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犯罪、不作恶，少犯错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交代人

土建中队

蔡天一

70年，13/6.

#### 四、辨正

看到四十年前“反动诗”档案，不能没有感叹、不能没有思考。所有这些今天来看，有何“反动”可言？可能否得出相反结论，今天看它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呢？肯定不能。我们做“知识考古”，意义在哪里？还有，深入现场对我们这些历史学爱好者，会有哪些启迪？

还是先扣紧题目，讨论蔡楚先生的诗。

其一、蔡楚 1960 年代的写作，真实性上没有问题。

当然就具体作品言，不能没有分析、辨证。比如写于 60 年代初的《乞丐》，究竟哪一年写的？目前有三个版本：“我这首诗大约是 63 年初写的”（3 月 8 日）；“62 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我想现在已经是 1962 年了，为什么反出现了这种情况呢？”（5 月 6 日）；及后来“公开出版”的纸质本（我看到的是 1993 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所出，蔡楚、陈墨诗歌合集《鸡鸣集》，与 2008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所出《别梦成灰》。仔细对照了，两书诗歌系年是一致的），该诗后标注时间“1961 年 12 月”。当然出入不大，究竟哪个准确？想来该是“后起”纸质本。关键在 5 月 12 日交代，“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 岁便能写出好诗来”一句。作者 1945 年出生，16 岁是 1961 年。当然 62 年初，也不妨模棱成 61 年冬。可对年轻作者而言，16 岁写出一首好诗与 17 岁时写出，我们知道意义不同。那为什么两次交代，写作时间有所提前？我猜想是一开始时，他想避免给人“年纪那么小就如此反动”的坏印象。人的记忆在反复锤炼，作者也在反复考订。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较复杂。3 月 8 日交代“是 63 年 8 月调成都砖瓦厂前写的”，而且过程很具体，“把自己比作憔悴的花”。问题在于，标题“别上”怎么能说通？2008 年 12 月 8 日，蔡楚先生跟笔者邮件讲，“《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 64 年，街道上逼我下乡的感慨”；2009 年 4 月 9 日邮件更讲：当年“交代”不一定都真实，那时避重就轻是能理解的。他郑重写道：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 1964 年时，小天竺街道办事处周主任和派出所的董所长逼我上山下乡时的矛盾心情的写真，他们威胁我若不去就送我去劳教。当时我身体有病，到川医附属医院诊断，医生出具了“风湿性心脏病”的证明才避免了下乡。“交代”中把“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改成到社会去了，年代也改早了一年，就是害怕被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想想看，只有上山下乡才可能戴花，就会明白我的指向是上山下乡运动。

总之，我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是事实，具体的写作日期不一定完全准确。

——该怎么看呢？一般情况下，伪“地下文学”、假“潜在写作”，倾向于把自己写作说成越早越好，可蔡楚先生坚持此诗比档案中“交代”晚一年。网络版《别梦成灰》更在诗后标注“1964 年 10 月”。看来此事他很在乎。经过多种材料、综合判定，我现在倒向了作者意见。理由么，有几点：一是 1964 年，全国大张旗鼓推动上山下乡。像蔡楚那么“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受胁迫基本不可设想。而从专案人员在此诗标题后加的小三角符号看，《别上一朵憔悴的花》在“反动”程度上，似乎与《乞丐》同类。二是作者那时确实有那种危险或嫌疑。据档案中小天竺派出所《蔡天一的单行材料》（整理时间：1964 年 12 月 24 日）：在 18 岁时蔡已有“主要犯罪事实”：一是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二是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其中有一条：“今年上半年，蔡污蔑

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好多学生都跑回来了，下农村是受罪，农村是杀广阔天敌。’”如真的“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在那个时期，将“吃不了兜着走”。三是不要忘了，就在蔡楚被关押、审查的同时，南京知青任毅因为一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也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被捕，最后“一曲知青歌、九年牢狱罪”。而且人们还说，在那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算是一个轻判。如果考虑到此类“上下文”，则作者交代时避重就轻，对本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其二、对照前后版本，则蔡楚诗歌文本几十年无大改动。馆藏“交代本”与后来纸质本确有不同，但很难说是“重要修改”。

略微细看的话：《无题》只有一处标点位置挪动，可以说原封不动。《乞丐》、《给你》略有改动。《乞丐》的标点符号，有几处不一样：“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在句中加了顿号；“自从田园荒芜后……”、“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后面加了省略号；“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标点调整成“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句子方面有两处变化：交代中“褴褛的衣襟，颤抖的手，人们瞥见就躲开”，变成了“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他等待着啊，蜷伏着，他在等待。”变成了“长夜漫漫，他在等待！”应该说，更凝练了。

《给你》一诗有六处改动，五处属于细微的：题目改为“给 zhan”，“媚月”改为“眉月”，“您！”变成“你？”，“天真的面容”变成“纯真的笑容”，“不，”变成“不！”，都属于推敲的性质。只有末句，“明月下久忆你深情的黑眸”，变成“波光里你的倩影光灿灿！”属于什么性质的改动呢？

相对而言，《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变动较大：题目变成了《题 S 君骨灰盒》，“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去掉“了”，“一切都全部装下”变成“一切都轻易地装下”，“静寂”改成“死寂”，“高亢的亲切的歌”变成“亲切而高亢的歌”，都属于锤炼的性质。只是结尾两句完全换了：“用斗争去迎接生活，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变成“再见吧，妈妈……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基调从高亢变为亲切，为什么有这个“重要修改”？而且，既然此诗是题在骨灰盒上寄托哀思的，应该说无修订之必要与可能？且存疑。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两个纸质本都未收入，《别梦成灰》网络版倒有。基本改动不大：“小妹垂手睁闪着眼睛”，成“小妹垂手睁圆着眼睛”，一字之改；“弟弟悄声问我：‘你还回来吗？’”，成“弟弟悄声问我：哥还回来吗？”，一字之改，直接引用没了；“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成“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也是直接引用没了。要说最大不同，则交代中“你的儿子到社会去了，/我会为人民辛勤劳动——对你作最大的报答”，变成了“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我将勤奋地为祖国添砖砌瓦”。关于这个，孰是孰非，前面已经涉及。我倒觉得，作者的“后设阐释”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增砖添瓦”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而“到社会去”给人感觉怪怪的（因为严格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社会上”是个负面的词）跟“报答母亲”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总体讲，蔡楚先生 60 年代的作品比较成型，前后说不上有什么影响整体立

意、风格的大修改。至于个别语句、标点方面的变动，只能被认为是苦吟、推敲的体现。属于中国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性质。而且我觉得，有无那些更改，其实无关宏旨。

所以，他的这些诗，当然“属于”60年代。

其三、他的诗没在官方刊物发表是事实，在1960年代他也没有涉足“地下刊物”。但不能认为，他的写作是“潜在写作”。他不是放在抽屉里的。多的不讲，起码他的《乞丐》在圈子里得到了阅读，起码他的《悼》得到了何蜀的“批评”，起码他的前面六首诗，在风雨如磐的1970年惊动了“组织”，起码他的这些“反动货色”“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显然已不是处于“潜在”状态，而是产生了影响的。

## 五、补充

首先，关于蔡楚其人其诗，我想多说几句。

前面“钩沉”出他60年代的“反动诗”文本，披露了他在专政斧钺下的自我陈述和自我批判。可是对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歌，我没下专门功夫研究。老实说有时候，受制于一些审美时尚或偏见，觉得他们（到1980年后，蔡楚有了更多诗友）的诗更多青春写作的特点，更多受戴望舒、何其芳、陈梦家乃至饶孟侃……的影响，好像缺少自己鲜明的特色与美学建树。对他的作品缺少全面研读（不能全怪我，当然也不怪他），导致了这一点。

就是现在，我也只能蜻蜓点水地，谈谈对其人其诗的印象。他的朋友陈墨说他是“诗痴”，我倒觉得他是半个世纪以来地下诗坛的尾生。就是中国古代抱柱而死的那位，“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抒写着海枯石烂的热忱。从他的《乞丐》开始，他就开始等待戈多。这位新中国成立时才几岁的少年，只因为出生在“反动家庭”中，而活得喘不过气来。援用他的朋友九九的话讲：“命运像一把黑色的大伞”。到文革爆发不久，父母亲相继冤死。据馆藏材料披露：他曾跟人“狂妄叫嚣”：“我是没有欢乐的。领尝人间的痛苦，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我只有痛苦，没有笑，如果说有笑，那也只是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联合专案组《蔡天一的单行材料》）

古代中国的诗人说“不平则鸣”，外国人则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蔡楚这位一心等待的赴约者则说：“我的文学起于寻求自我安慰，归于追寻心灵自由。”看他“交代”出来的诗，《赠某君》的失落感，《给你》的窒息感，都真切而生动。《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中，那对蓝天、旭日、朝霞的向往，以及“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何等真切动人。《无题》更是李商隐一样的让人叫绝。“心温柔地腾跳，/当我们十七岁那年”！何须去考证，这是所有十七岁少年的故事。

文学有个常识，就是诗无达诂。因此，《乞丐》固然说是写实，我以为更是诗人自况。而关于这一点，恰是他向专案组不能触及的。翻翻他的诗歌集子，长夜漫漫中的等待确是醒目主题。诸如：从“看到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赠某君》，1961年），到“常常我梦着忆着爱着，/忍受着胸中的痛苦”

(《爱与愿》，1973年)，再到“多年来总做着同样的梦，/在梦里我们重又相逢”（《梦》，1973），直到慨叹“我已经看了多少次，/多少次我的幻觉和沉思？”（《题像》，1976年），确实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论者们喜欢引用他1976年写的《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它沉沉的，不说一句话，  
不掉一滴泪，如同我的悲哀。  
它缓缓地，不迈一个急步，  
不烦每次弯曲，如同我的徘徊。  
有时，它闯入我的梦境，  
带我飞越关山，飞越云海，  
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在那间暗黑的屋内，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爱，  
凝住我力的爆发，  
凝住我血的澎湃。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此诗让人想到冯至名篇《蛇》，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有论者精辟地指出：跟那些“相信未来”的幸运儿不同，“蔡楚的‘等待’则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康正果）我以为说得很深挚。即就是里尔克所讲，“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除了《等待》外，1976年写的《祭日》同样沉痛：

岁月把日子打个结，

系住人们心中的悲哀；  
我把岁月打个结，  
系住我长久的期待。

另一方面，则“不平则鸣”。像他自己讲的，“我吃惯了新鲜饭，多了一点野性”。他和他的“野草”诗友在一起，对一切标榜的“路”不信任。《我的忧伤》宣布，“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1983年）；《选择树》揭露，“那些自称森林的形像，其实只是一株红罂粟”，而“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1994）《再答明辉兄》则砥砺：“此生既定作一棵野草，/岂能不高歌被桎梏的自由！”（1999年）从他的网络版《别梦成灰》，看到了一首极其“反动”的诗：《枪杆子下面》（选自《野草》总第32期，1988年4月）：

枪杆子下面阴风惨——  
八百万！一千万？两万万？  
民族的儿女从地府齐声嘶喊：  
枪杆子下面出皇权！

我敢说，这样的诗在大陆任何出版社和官方诗刊（虽然他们回避“官方”一词），都不会登出来。哪怕从写作的1988年到现在而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哪怕现在貌似文学、出版很繁荣。像“潜在写作”、“地下文学”一类题目，堂而皇之在官方、半官方的书刊上亮相。乃至像《我军将士的百年一哭》那样的主旋律，堂而皇之进入《食指诗选》，得到了近乎“经典化”的待遇。——可类似《枪杆子下面》这样的诗作，其实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它是“潜在写作”吗？无论如何都不是。“潜在写作”的定义，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想来想去，它只能归到“地下文学”名下。

其次，想说“地下文学”是一条长流的河。

有论者说，挖掘“异端文学史”，无异于“文学化石的挖掘”。其实仅就蔡楚的写作言，这个等式完全不成立。原因在于，蔡楚及其写作不是完成了的过去，而是延续至今的正在进行式。他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杆。哪怕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发表上的限制。你可以说一个人很丑，可不能宣布人家不存在。我想任何人面对庄严历史和荒诞现实，都要保持慎重甚至几分敬畏。毕竟我们的时空，被破碎得太厉害。可还是要看得长远。廖亦武为《沉沦的圣殿》一书写的“楔子”有言：“‘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我想未必如此吧。既然许多人还在、还活得很起劲。我想顶多是重新遮蔽，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至于更多的，就



说不上去了。

——但是，重新洗牌、重新遮蔽，或者规诫在一度松弛、局部松弛后重新全面加强是事实。如果用一句老话，则属于“铁一般的事实”。即以蔡楚的诗而言，馆藏“反动诗”共六首。是否他1960年代总共写了那么多？大概不是。很难想像，一个酷爱诗歌的青年，在一个人爱情最旺盛的16到25岁间会写那么少。据档案中谢××《揭发蔡天一》材料称：“……（蔡）60年到62年写了很多攻击新社会的诗，如‘我不要饥饿，我渴望自由，奔出了这破碎的家，妈妈瞪着我，把眼睛鼓得老大、老大’，共写了几十首。”当然，你可以说是孤证。可对照他“后出”的纸质本（《鸡鸣集》还有《别梦成灰》），则起码有《致燕子》（1964年9月）、《依据》（1968年8月）两首，几个月的审查中他并没有吐出来。《致燕子》貌似问题不大，倒是《依据》一诗，我能够想像他为什么“打死不说”：

……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据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表彰它表达了独立意识和艰难中的持守。有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也不尽然，聪明人会说“死脑筋”）可在那时啊，只配叫“花岗岩脑袋”。

问题还有：对照纸质本，馆藏中的《赠某君》、《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未收进去。后出的《别梦成灰》网络版，这两首倒是收进去了。不过一对照，发现2008年中国文联版《别梦成灰》中，有十五首诗作未收进去，如：《广场夜》、《枪杆子下面》、《唢呐》、《如果风起》、《黄色的悲哀》、《孔形拱桥》、《最初的啼叫——献给〈野草〉二十周年》……等。我猜对于作者来讲，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五十年的写作，那么薄的诗册，简直惨不忍睹。为什么谈论这个？我突然意识到，有“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有文革前的地下文学，还有文革后的地下文学——无论它叫什么名称，都是那么回事。当我看到一封书信，逐渐认定了这一点。那是公元2002年，著名老诗人牛汉在跟研究者交心：“从我的写作状况来看，这‘潜在写作’的状态并未真正结束，而且沉潜得更深，难言的苦楚与无奈，时时在困扰着我。……我相信仍有不少作家（其中一定有许多从来不是作家的人）仍默默地写着另一种心灵的面对历史的自白。”（《春泥里的白色花》第436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

这才是让人揪心的地方。

从好的方面看，你可以为民族元气不丧失而高兴，所谓“岩浆在地下运行”等等。可是，我担心时间久了，所谓深水鱼会成化石。我担心时间久了，地下河会成内陆河。就像成都诗人陈墨1964年所写的《蚯蚓》一诗：“谁能看得见你哟

/ 黑暗深处的躬耕者？ / 谁能听得见你哟， / 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 / 出来吧！ / 小小的灵魂。 / 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 / 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可呼唤归呼唤，“出来”见光谈何容易。再举个例。人们承认，“林昭在狱中写过不少的诗。那是用倒流的泪顺流的血写成的，至今还大约封闭在提篮桥监狱的档案里。”（林斤澜）可其实流布出来又如何？就拿林昭的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来说，早就大白于天下了。可我就没见到，哪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它写进去了。只能感叹着陈伟斯《林昭之死》中发的感叹：“……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

——屈指一算，距陈伟斯先生感慨，又三十年过去了。

最后想说，那寒气逼人的地方，有地下文学的藏经洞。

从蔡楚的“反动诗”档案，想到还有大量地下文学材料，在各地庭院深深的档案馆里。尤其公元1970年的档案。当然此前的也有（如1968年林昭），此后的也有（如1973年岳重），可地球人都知道，1970年有雷厉风行的“一打三反”。说到“一打三反”，我竟有些微微颤抖。虽然那时我还很小。看到一则报道，说刚去世的历史学家高华，那么勇敢卓绝的人，提起“一打三反”红色恐怖，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余悸”。是啊，说起来谁不害怕：“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我们知道，很多著名人物是那年被杀的：遇罗克、王佩英、蔡铁根、杜映华、陈卓然、冯元春、毛应星……，张志新也是那年被判无期，后来被杀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了。说起来，得感谢遗忘的力量，让我们休养生息。

对研究“异端文学史”的人来说，1970这一年意味着什么？据宋永毅先生的研究，那时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其中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迫害（《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事实上，他们的所谓“罪行”，正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地下读书活动”。不过如此。

还有别的例子：1970这一年，南京知青任毅因《知青之歌》判刑，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被捕，异端诗人黄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65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那年1月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还从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寒气逼人的岁月：1970年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书》，披露了一份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的文件，一次性枪毙十三个人。主犯汤福玺罪行中，有“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同案犯鲁少山罪行中，有“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孟源罪行中，有“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从这个判决书，不能不产生联想。

容我提出自己的猜想：如果说 60～70 年代的中国地下文学好比敦煌莫高窟，是一条方外的长河寂静无声，那寒气逼人的岁月，1970 年全国各地的档案就是藏经洞。我当然不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话。可对有志于查勘地下文学现场的人来讲，不失为一个契机。去年谢世的现代文学专家、深得学界敬重的樊骏前辈二十多年前就提醒：“如果说过去主要是档案馆向我们关上大门，那么如今倒是更多的在于我们没有迈向它的大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当然我们会感到，迄今还是芝麻难开门。

蔡楚还在写。2003 年写了首《秋意》，在结尾他缓慢说：

我到哪里去？又从哪里来？  
人生已秋却弄不明白  
问天地，问鬼神，问自己  
一池乡思爬满青苔  
心是秋衣，用苍茫去剪裁

2012 年 3 月 26 日于川西山中

---

【蓦然回首】

## 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 ——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何 蜀

读李亚东的《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 1960 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意外读到他从历史档案中抄出的一句提到我名字的话，那是蔡楚在 1970 年就其一首“反动诗”《悼》所写的交代中的话：

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

我惊异于自己的记忆，竟会在岁月逝水的反复冲刷下对此事毫无印象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思想认识确实就是如此，正处于一个十分狂热、激进、偏激的状态，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一概嗤之以鼻，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了，必须重头开始，另起炉灶，开创一片全新的天地——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实际上自己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接触和了解极为有限，比如蔡楚早已在文革前就精读熟吟的戴望舒、闻一多、汪静之的那些诗，除了一两首或个别句子外，我都基本上没有读过。只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很少几首，从内心讲是很喜欢而且过目难忘的，但在意识上却总是告诫自己那不是正道，只

有郭小川、贺敬之以及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才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正宗，才是效法的样板。

李亚东兄查勘地下文学历史现场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他还只看到了这些“反动诗”及其相关交代材料，不了解在这些诗及交代材料的文本背后还有什么。我愿再提供一点有关《悼》诗及其交代的背景情况。

蔡楚本名蔡天一，他的那首“反动诗”《悼》，是为无辜死于文革武斗的孙从轩写的。

我和他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时我们都在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是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的工人——不是真正的“石油工人”（虽然我们经常要唱那首“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流行歌曲），只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的临时工。

这场大会战，我们是从文革前夕的1965年开始参加的。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劳动工具仍然主要是锄头、扁担、箩筐、钢钎……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进行施工。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乐至、蓬溪等大中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几个大队都是以重庆人为主，基本上是按一个街道办事处编为一个中队。成都人在文革开始时只剩下了一个中队（一百来人），即蔡天一交代中落款所写的“土建中队”，我们那时都称他们“成都中队”。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群众造反高潮中的1966年底、1967年初了，在位于荣县东兴场旁边一座小山岗上新落成的筑路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当时整个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新场附近一处山坡上兴建的红村，据说其他各处按计划要建红一村、红二村、红三村……是否都建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筑路处被排为红七村，文革中为了名称上的革命化，也被写作红旗村。

我和蔡天一、孙从轩，用当年的话说是“造反战友”——都参加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其实我们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时也叫“狗崽子”），我的父亲是“右派”，蔡天一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孙从轩的父亲是“小业主”（他父母曾开有一家小中药铺），成都中队的另一个朋友张征祥的父亲是“资本家”，本来都不应参加文革造反，为什么我们也成了造反派甚至还当了头头或骨干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那个临时工队伍的整体状况。

当石油会战指挥部开始在四川各地招工的时候，已经是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后了，这时在社会上还没有正式工作、能够应招去参加石油会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切工作的“纲”加以强调以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首先都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中相当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此成为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有的已经被迫上山下乡去当了知青），“社会青

年”中还有个别高中或大学没有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而被强令“自动退学”的学生（不退学就要开除）。当听说石油大会战招工而且无需“政审”来者不拒的时候，这些人当然就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加。因此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还有少数未成年的小学生和个别被强令退学的大学生），成年人则大多是本人有“问题”的，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当时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头上仍然有一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被原工作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的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在某些人的眼里，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队伍里几乎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每个工程大队都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师傅是党员）。

由于这样的人员构成，文革发展到群众组织遍地开花的全民造反阶段时，我们那里不光造反派组织，甚至连保守派组织都几乎找不到几个人是“根红苗正”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们就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被推到了第一线。

此外，我们都是长期受那种“革命教育”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当时有一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苦，也不是死，而是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在长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压制甚至打击之后，突然之间，一场由“伟大领袖”发动的、席卷全国的群众造反狂潮把原有社会秩序完全打乱了，颠倒过来了，似乎让我们有了合法的机会“参加革命”了，甚至可以表现得比那些过去歧视压制打击我们的人更“革命”了，而那些过去一直以“革命”自居的当权派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们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犯下了“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这样的人有了一种得到“解放”的扬眉吐气之感。这样，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戴上红袖章，投入到了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胡平语）当中。

在1966年底、1967年初我和蔡天一他们相识的时候，我还不到19岁，蔡天一年长我3岁，孙从轩年纪还大一点（1941年生）。我因在此前被打成“反革命”监督劳动两个多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由筑路处党委正式平反，这时自然成了造反派，被推举到几个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在红旗村联合组建的造反司令部当“勤务员”（如前所述，我们那个司令部的“勤务员”里没有一个是“根红苗正”的），我主要负责写文章、刷标语、刻印传单、上广播宣读各种稿件（广播是处机关设在红旗村的有线广播，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去排着队自由宣读自己的东西，最混乱的时候甚至有职工到广播上喊他的家属快把钥匙拿回来开门）。当时成都中队驻红旗村坡下，我听说他们中队的几个“眼镜”文化高，很有头脑，这几个“眼镜”就包括蔡天一、孙从轩，还有张征祥。当时一般都称他们蔡眼镜、孙眼镜、张眼镜。

看得出来，孙从轩在成都中队是有威望，有号召力的，他个子不高，皮肤白晰，眼镜后一对小眼睛，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经常见他在破棉袄腰间拴根稻草

绳，头上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也很少戴端正，总之做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后来知道，他父亲早逝，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成都晚报社的“右派”，他本人因“家庭出身”问题于60年代初期被甘肃省农业大学勒令退学。在筑路工地上，这样的大学肄业生自然要算凤毛麟角的“高知”了。我们临时工当中像我这样的初中生最多。因毛泽东主张的愚民政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官方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往往是文化不高的老工人、转业军人之类。对这种“依靠对象”的文化素质，成都中队就曾有过一个笑话：“十六条”刚公布过后，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主要是政工、保卫干部及一些老工人）派人下来“宣讲十六条”，到成都中队宣讲的那位“依靠对象”，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自作聪明地讲解说：你们晓得巴黎公社在哪里吗？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民主选举搞得最好，所以中央把它作为样板……听得成都中队那些略有点文化知识的“非依靠对象”们都忍俊不禁但又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孙从轩当时与身边的蔡天一议论了几句并笑出声来，就被当场揪出来批斗——这是他后来带头造反的直接原因。

后人可能难于置信，我们当时的造反，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号召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真的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来不去考虑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甚至没有想到要借机把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临时工身份改变一下。当时只有成都中队的老夏是这方面的明白人，他不知何时联系上了那个专门为临时工谋利益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即后来被中央明令取缔、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围攻、砸烂的“全红总”），参加进去后还当了个什么分团的头目，但他基本上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几个人跟他跑。我们这些自认为“正统”的造反者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在搞“经济主义”，背离了“斗争大方向”。

1967年初，毛泽东在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同时，又通过他亲自批准发布的“公安六条”、“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全国大张旗鼓发动了一场打击社会上“牛鬼蛇神”的“镇反”运动。3月初，“镇反”之风刮到石油会战工地，孙从轩、张征祥以及那位老夏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荣县监狱。从公布出来的“罪状”中人们惊骇地看到，孙从轩参加过“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救国军”！——人们后来才知道真相：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母亲在他两岁时即让他接受了洗礼，从他母亲的角度看，他是皈依了天主教。不过，孙从轩从8岁开始即“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接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党化教育，当时根本就没有可能参加宗教活动，因此他显然说不上有什么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在成都中队没有人知道他与天主教的这一层关系，只有掌握人事档案的官方才知道。那个年代，凡信教都会被视为“反动”，信洋教简直就等于是“帝国主义特务”，这种身份还参加和主持造反，这当然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孙从轩他们在狱中刚待了一个月，1967年4月初，善于变脸的毛泽东又把明明是自己部署搞起来的“镇反”说成是下面的支左部队和专政机关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并与所谓“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进行批

判（其实许多地区的“镇反”都是在“二月逆流”已经被否定、批判之后才开始的），强令转向，各地赶紧给“现行反革命”们平反，监狱陆续放人。孙从轩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们正被解雇回家——石油会战因为文革的冲击已经难以继续，加上各级领导不愿再看到这些重新平反的造反者们找他们的麻烦，就干脆解雇了事。我们回家后不久，四川各地就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从动乱走向新的更大的动乱，陷入大规模武斗之中。招工无望，我们一些人又返回红旗村“造反”。成都中队的一些人还通过蔡天一的努力，办成了复工手续，重新领到了工资。

不过，孙从轩返回筑路处复工后，没有再像“镇反”前那样积极参加造反活动了，或许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所谓“大民主”愚弄民众的真相，或许他知道自己那个“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宜再参与造反活动，再加上他家庭的困难：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打成“右派”后失去公职，靠在成都走街串巷补铝锅为生，他亲姐姐据说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下乡参加“四清”时溺亡。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卧床不起，需要供养。他赶到处“全面内战”、停工停产之机，悄悄跑回成都，一边打“黑工”——蹬平板三轮车送人送货挣点脚力钱养家，一边照顾老母。

不幸的是，1968年4月21日，他蹬平板三轮车从成都无线电机学校门口经过时，被该校的“红成”派“野鸭子”（当时成都人对那些不是为派别利益作战而是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的武装团伙的称呼）人员拦住，要他帮忙拉伤员去医院（伤员是“野鸭子”与“红成”派的川医“九一五”武斗人员争饭吃打伤的），在枪口下，他不得不照办。当他被押着蹬平板三轮车从四川医学院门前经过时，占据该校的“九一五”武斗人员又跟“野鸭子”展开枪战，他无辜中弹身亡。终年27岁（生日刚过三天）。尚未成家。

那时我和张征祥都在成都（我以无业者的身份在那里为朋友们义务当“笔杆子”），噩耗是蔡天一来报告的。他通过成都警司到殡仪馆的无名死者中查到了孙从轩的遗体，亲自送去火化。当时我们那个组织已经归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旗下，成为该兵团下属的石油系统分团。于是就以石油系统分团的名义为孙从轩发了讣告，举办了追悼会，还从四川大学拉了一车花圈（川大当时经常召开“烈士追悼会”，堆着不少花圈）来布置会场。讣告是成都中队的沙世谦起草的，其文字很有时代特色，特录此以供了解——

## 最高指示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 讣告

高天哀鸣，大地悲伤！

正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灿烂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向全川石油战线上的《红十条》派的战友们沉痛地宣告，我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优秀战士孙从轩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为捍卫《红十条》，于4月21日中午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反坏分子所枪杀。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我兵团战士闻此噩耗无不义愤填膺，挥泪如雨，旧仇新恨，交织于胸。血债要用血来还！

粉碎右倾翻案逆流！

还我战友，还我血！

孙从轩烈士出身于小商家庭，现年27岁，65年参加石油建设工作。孙从轩烈士无限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一贯踏实认真，曾被评为优秀的生产突击手。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斗争。被走资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二月黑风中被打成“反革命”，投入荣县监狱近一月之久，在狱一直坚持斗争，出狱后更积极地参加捍卫《红十条》的斗争。不幸于68年4月21日中午路经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穿入了他的胸部、大腿等处。孙从轩烈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壮丽誓言。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孙从轩烈士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吧！我兵团战士誓死捍卫《红十条》，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死难烈士万岁！”

讣告中用了许多当时的“主旋律”语言，称孙从轩“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云，显系虚美不实之词，我当时对此是颇不以为然的。后来我才知道，成都中队朋友们的苦心，不过是为了以此高调给孙从轩在筑路处争取解决抚恤问题，为他孤苦的老母多争得一点补偿。

孙从轩的死讯没人敢去告诉他母亲，最后只好由他哥哥向他母亲谎称孙从轩被送去劳改了。孤苦的老母亲就在不断呼唤儿子的呻吟中辗转病榻，拖了年余，撒手归天。（右图：孙从轩遗像）



蔡天一的那首诗《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写的，诗云：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全部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静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再见吧，妈妈……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最后两句，是回顾当年他们最爱唱的苏联歌曲之一《共青团员之歌》——在“毛泽东时代”，文艺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人们大量接受的就只能是苏联文艺：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一旦毛泽东宣布苏联是“苏修”了，人们久已习惯的对苏联文艺的爱好就一下子变成了可能被当成罪名的危险。于是，蔡天一在写交代时就煞费苦心地将后两句改成了——

用斗争去迎接生活，  
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



以后研究“文字狱”的人们，可能得花费许多心思来破解这首诗到底“反动”在何处。其实蔡天一的改动是无济于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已经成为“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态的常态。对于那些身为专政工具的审查者来说，改后的那句“用斗争去迎接生活”仍然可能推断出问题——你两个反动家庭的狗崽

子（其中一个还是“天主教徒”），想跟谁斗争？想迎接什么生活？

（上图：后排中蔡天一，前排左1张征祥，左2何蜀，1968年在成都合影。）

可惜我一点也记不起蔡天一与我谈诗的事了。对于他来说，写诗就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与精神寄托，而我那时正专注于瞬息万变的文革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刚揪出了又一个“反党集团”，周恩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宣布揪出“杨、余、傅”的讲话时，一口气领呼了一长串“打倒”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一切阴谋家、两面派！”全国掀起“打倒黑干将，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的又一轮揪人整人新

高潮。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势下，我完全没有把一首小诗的事放在心上。

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蔡天一谈诗，而是蔡天一唱歌，用他那浑厚低沉的次中音唱外国歌曲，特别是那首苏联歌曲《黑龙江的波浪》，在《外国名歌 200 首》的众多歌曲中，这一首就是听他唱过后我才倍加喜欢的。可是这也是当时不敢放声高唱的名歌之一，特别是在 1969 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谁敢唱苏联人对黑龙江表示“我们坚决保卫您的安康”？

还有一个难忘的印象，是蔡天一在 1976 年出差到重庆时来我家（当时他已经在成都轴承厂当了工人），眉飞色舞地讲起成都春熙路贴出的大字报《号票歌》，那篇不知谁写出的嘲讽文革“大好形势”的民歌体大字报，引来大批民众围观，争相传诵，“烟要票，酒要票，肉要票，糖要票。样样东西都要票，一人发了一百号。……一号票买豆豉，二号票买粉条，三号票买点心，四号票买花椒……烟票锅票灯泡票，花生糯米月饼票。缝纫机要工业券，自行车儿票拈票……美帝反动苏联修，只有我们最最好……”（我当然不可能记住他背诵的这些文字，这几句是从后来《龙门阵》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抄的，但内容完全就是他当年背诵的那些。）他几乎把整篇内容全背给我听了，还告诉我，有人在旁边加批了一句：“邓兴国你不要跳，你晓得下个月烟票是几号？”邓兴国就是当年我们那个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1976 年时他正纠集了一些人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赞同他们那样闹了，大乱十年，民心思治，老百姓谁还愿意那样穷折腾？再加上文革以来政坛上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充分表演，已经让老百姓不会再相信政治家们的表面文章了。一个连基本生活用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国家，还天天鼓吹“到处莺歌燕舞”、“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谁信？

以后我们各忙各的，联系时有时无，因此对他那段写诗的经历及“反动诗”案并不清楚。直到这次为写此文我才了解到：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蔡天一受到成都一诗友的牵连，起因是成都几个文人趁动乱之机相约到峨眉山游玩，因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大动乱极为不满，下山时他们把沿途的毛主席语录牌逐一推倒，回成都后此事被检举揭发，进而打成“反革命集团”，蔡天一文革前就与其中的人有过诗文交流，这时又有人在被迫交代时提到了蔡天一文革前写的几首“反动诗”，成都公安局军管会发函到筑路处，因此蔡天一就被要求写下了那些交代。

随后，蔡天一被筑路处开除（而不是解雇）回家。这时他的父母都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父亲蔡启渊（1909~196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处工兵科上校筑城教官。1968 年 5 月 25 日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被批斗致死。1982 年平反。

母亲邱淑珮（1917~1967），成都树德中学毕业，曾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文革中因受到批斗威胁，于 1967 年 7 月 8 日在家中自杀身亡。

蔡天一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当时面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71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蔡天一“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但并未通知本人，实则实施内控，出门要向街道上的监管人员请假，白天被盯梢，夜晚常会被派出所来“查夜”骚扰。张征祥有一次到蔡天一家去玩，正碰上分管那一地段的户籍警察陈某在盘问、“敲打”蔡天一（有时蔡天一正看书时被这位陈户籍撞见，书还会被收缴，收去的书包括艾青的《诗论》、李劫人的《风土什志》和《聊斋志异》、《斯巴达克思》等）。看到张征祥进屋，那警察用审查犯人那样的诡异眼光把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板着脸问他是什么人，住哪里，来干什么，并且说：“这个地方不能来！”张征祥没好气地拿文革前一首粉饰现实的歌曲的名字回敬他：“啥子不能来？祖国大地任我走！”

直到文革结束三年之后的1979年，经蔡天一再三申诉，他那所谓“反动诗”案才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一个青年因几首抒写个人感情的小诗而遭到的厄运。

（右图：平反后的蔡天一留影于薛涛井。）



蔡天一被开除的事当时我不知道，我正在重庆为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焦头烂额。后来总算在一家钢厂当上了工人，生活稍稍安定之后，1973至1974年间，我在“高温、有毒、重体力”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作之余，周末回家的闲暇里，断断续续写了一首回顾自己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的长诗《青春》，其中有这样几句：

像那羽毛未丰的鹰雏，  
还等不到冲进生活的风雨  
    便向头上的蓝天  
        发出心底急迫的、嘹亮的  
        叫声，  
你开始  
    把最初的诗句  
        悄悄写进了笔记本。  
诗……

我们那时候真正懂得诗吗？  
可那又有什么要紧！  
难道我们不是在  
用诗来描述理想  
用诗来看待生活  
用诗来设想人生？  
青年时代——  
诗的时代呀！

.....

那些从不会编进《选集》或《全集》的诗呀，  
在它们杂乱的韵脚中，  
在它们幼稚的比喻里，  
在它们的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  
有我们多么真挚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并不能自由抒写自己的感情，即使我当时所写的这类自认为是“思想健康”、“奋发向上”的诗，也只能私下里在几个朋友间传看、交流，还得提防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断章取义分析上纲遭遇“文字狱”……

如今有人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有人还在呼唤要“再来一次文革”，他们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健忘，都不了解或是故意无视那个时代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桎梏和戕害。蔡天一的“反动诗”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那个时代，一个正值诗情年华的青年不能自由写诗抒情，特别是不能自由抒写与当权者认定的所谓“主旋律”不合的个人感情，否则，轻则会被视为“思想不健康”（在亲朋好友间也会遭到善意的警告或如我对他的批评那样的冷遇），重则会被认定“思想反动”甚至成为专政机关清查的“罪案”。

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联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毛泽东时代”，包括郭沫若这样的“大文豪”在内，谁能为“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而发愤作诗？

那是一个非诗的时代。

那是一个非人的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还有人在为它招魂，但我相信它是回不来了。

2012年11月18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

【蓦然回首】

##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

杨世元

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就是草扎的祭品，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来，知识分子也就身不由己地要刍狗化，还是第一批被推上祭坛的牺牲品。我在重庆掀起揪“三家村”的第一潮恶浪中，在报上被半点名，那就不仅是刍狗，还是供大批判的草垛了。箭簇集身，积毁销骨，我被告知的唯一出路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深挖潜意识，狠斗一闪念，力争在文革大火之中，能烧出一个新我来。于是检讨复检讨，甚至把当年投身反蒋学运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观念，也视为一种原罪。怀着负罪感去参加朝敬仪式，也就如旧时代的腐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衷心祝祷我心目中的先知万寿无疆，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永远健康。

谁知这位接班人竟驾空遁而逃。本来是“你尊我尊神，我顶你顶峰”的二人台，忽地坍了一角，毛主席索性高抬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批林批孔批周公。几年来我跌跌撞撞地跟复跟，这一下孔丘成了丧家犬，独撑危局的周总理其势危殆，战无不胜的救世主又大退神光，会出现长夜吗？所幸我按毛主席的批评指向读了《十批判书》，于文革顿挫间得顿悟。虽非茅塞顿开，也有如刍狗开眼。

郭沫若五四时期有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的历劫体会：刍狗只是开了眼，若没有进一步植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升华不了天狗，我也就不能“便是我了”。

文革后我转入史学岗位，按“我”说，就该求实存真，写出以人为本的信史。但《道德经》又说了：“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橐籥就是风箱，“以阶级斗争为纲”已成破皮囊，再有人拉也不会怎么来气；然而中国之大，形色之特，必会有别种样的橐籥在。你要秉笔直书，就可能触犯着什么而被扯进某种暗箱里去。如此，那就遵老子所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好了。谁知积习难改，遇着文革研究者来谈浩劫，忍不住絮絮叨叨，竟被整理出一大叠口述资料。既没守住，那就不管数之穷与不穷，就按“我便是我”，再在口述资料上作些补述。

文革是亿万人受难的历史浩劫，实在不该在时下的尘嚣中作尘封，必须多人多侧面地来谈，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见其本然。也只有历史地具体地识得本然，才能近于事实准确、评价公允地知人论世，进而识得所以然，以免历史的错误重犯。如果心态仍如刍狗，高蹈一些是“一看二慢三通过”，低俗一些是“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一旦在一定条件下文革又再来一次，恐怕就有更多的牺牲要供上祭坛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恶因与趋势，那就谢天谢地，只当一个过气文人在江渚之上摆谈老龙门阵罢了。

有，还是“莫须有”？

——“约稿信”是重庆文革的一个悬案

要研究重庆文革，1962年春节《重庆日报》的那封副刊约稿信，是一个重要文本。但是真要探究这封信，就会遭遇黑洞，会产生“有，或是莫须有？”那样的困惑。

有，当然有。重庆文革是从揭发“重庆三家村”开起端的，《重庆日报》连续发专版，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的大标题下，揭批张黎群、雷勃和王古泽的反党言行。声讨文章前有“编者按”，其中这么按着：“由王古泽授意，杨××执笔的1962年春节副刊约稿信，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办报纲领。”

文革的宗旨是反修，方法是抓纲。既然抓住了“修纲”，就该悬出示众，共讨共诛，而实际情况却只是在按语中点到而已。无论在报社或文联，都只是虚轰。工作组严辞要我这个被半点名的××作交代的，也只是追王古泽在副刊中的作为，不许另有攀扯；也就是《重庆日报》虽为“市委机关报”，副刊的事却与市委方面没有关系。可王古泽在副刊恢复时正在住院，也无关系，这条“修纲”套不到他脖子上去。情况是上上下下都明白的，却仍然这样按着批，当然“小旦长胡子——乱栽”，也就是莫须有。

“炮打司令部”，天意难测。在川主政的李井泉心有志忑，四川因政策过左死人太多，他又是在死亡高峰期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怀疑有四川的地下党干部向上告状，遂于在重庆已打出了“萧李廖集团”之后，趁文革之机，再作追杀。原是地下党员的张黎群、王古泽就因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巴山漫话》，被说成黑帮黑线，进而就因给副刊作者的一封拜年约稿信，把我给栓连上了。

点名或半点名的玄机，我无从窥测，但这封约稿信所反映的是大跃进到大饥荒时的政策转折。我正是这个时段在副刊岗位上，倒是可结合我的经历，说一说重庆文革首案的原委。

1958年春我从文联调入报社当“新闻战士”，首先受的“入伍教育”是：《重庆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各专业组的编辑记者都是党的耳目喉舌，编副刊的人尤要牢记：副刊是党报的有机统一部分，三版是一版二版的重要配合和必要补充，必须亦步亦趋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实践。我就是本着这样的操典去走正步的。

从我上岗开始，副刊就是一个劲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共产风、浮夸风煽情升温。热昏中，真是觉得共产主义社会指日可达，到时我们可要谦虚一些，要等苏联老大哥第一天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我们第二天才宣布。不料老大哥泼冷水，写了封信来，说苏联二十年代曾建公社，失败了，不仅破坏生产，还因饥荒死了人。毛主席为此愠怒，要作反击，方法是各地选一些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作调查，写出材料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向一切人作战。”在副刊组，我被调出参加人民公社调查，组长石大周却在反右倾中被掳下去了。王古泽在副刊组中主持“党的生活”和“理论学习”等专版，他是去过延安的老同志，当该他全面负责，但在物质供应困难的境况下，他经常有疗养住院等耽搁，实际担子就落在了我这个兵的肩上。

当时我是二十许人，接受再艰苦的采访任务都不怕，苦的是要编好副刊，却又摸不住魂头。如果上级党委的决定和人民利益有一致性，那还好办；如果不一致，耳目所见和喉舌所言存在矛盾呢？我所参加调查的沙坪坝区红旗公社和江北区中苏友好公社，就是重庆选出来的“特别好的公社”，要是写出来，达到毛主席所期求的“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就很有点底虚。“向一切人作战”

是政治任务，为此宣传上越是大哄大嗡，就越产生新闻报道的信誉差距，导致党报的人民性日渐丧失，也使新闻单位的肌体，在宣传畸化中产生敏感性病灶：对三面红旗只能唱颂歌，谁也不敢说有所失。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路线斗争，毛主席就是反倾向斗争中战无不胜的领袖，庐山会议一夜变症，就是眼前之例，彭德怀上书讲有失有得就被打成错误路线头子。大跃进和公社由总路线所派生，如果报道跃进中的得失，岂不意味着伟大领袖也可能出决策错误甚至是路线性错误吗？大跃进越跃越违情悖理，如果有人不敢公言而“鼓咙胡”，副刊就是最容易泄出怨气的地方，所以副刊就由总编辑袁明阮主管，并多设了几道审读层次，如提前一周交计划，提前三天送小样等等。可是袁总太忙，常常临编前会时还没有来得及看样稿，每每要向夜班编辑室主任发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夜班主任为免不虞之灾，总要找点瑕疵来说，使我经常挨克抓瞎。然而防不胜防，还是出了《“奋”与“愤”》的事故。

我们宣传中有发奋图强的口号，也有写成发愤图强的。西南政法学院院刊上有文，说“奋”、“愤”可通，“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让我们后来居上，因此愤怒，所以奋发。”我们转发了，没想到宣传部来电话说有错误。袁总将这天报停发重印之后，找我谈话，才知中央有通知，说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地方报纸不参加。袁老总批评说，这篇文章并没有政治错误，但刊发在《重庆日报》上，就是组织错误了。由于我没有听过传达，这次不需要检讨，但以后在中心学习组一定要坐得住，认真领会文件精神。

至于夜班主任听过这个文件没有，我就知道了，但觉他以后对待副刊稿件挑剔越苛，上纲越酷，举两条经他选入了《问题稿件汇编》的短文为例吧——

一、副刊发了篇知识小品《巧裁缝》，讲如何节约布料。他举发为：“泄漏了我市居民每人每年一尺八寸布的定量，为赫鲁晓夫攻击我们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提供证据。”

二、我为一篇短文加了《帝国主义，贼性难移》的标题，他举发为：“难移不是不移，而是可移；只不过难点罢了。帝国主义本性可移，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命题。”

副刊组和夜班编辑室是上下联手的关系，他们举发的两篇文章，不经过他的眼睛也发不出去，即使来了什么运动，真正挨板子的也是副刊编辑，他最多是把关不严而已。但当年的斗争氛围就有这么紧张，豆萁必须把豆子早早装进锅里，自己则钻进灶孔里去，以后真要问责，它就可以在釜下唱燃烧之歌了。

真正对我严格的是袁老总，他总揽全局，忙得来不能具体管副刊，因此焦心就重。那时我就听说袁老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但在延安学习时，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过审查，所以我对袁总是敬胜于畏，力避因副刊问题为他添累。那时办《重庆日报》有如风雨行舟，而且行经着峡江险段，驾长对水手橈夫大声吆喝，是船行险滩时的指挥方式，过滩驶入平水江面，老艄翁会带头唱号子的。有次我又挨了袁总批评，说我“书生办报”，我一时领会不到，心情颇灰。回家发现有一碗红旺闪亮的猪油放在桌上，母亲说，是一宿舍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同志端来的。

那年为应付大饥荒（当时宣传的是“苏修逼债”），我们伙食团上交了几头自养的肥猪，余下的宰杀后，后勤部门分了些下水之物给袁总，被他退回去了，后又分了片生猪油，不想袁总竟嘱他的夫人刘玉晋给我家端来了……我默默地接受了长者之赐，在日记上写下了两句话：我一定要以石磨般的肠胃，钢缆样的神经，坚守岗位，办好副刊。

然而粮食的供应日紧，报社不仅把园圃中的花木拔了，连篮球场也铺上了泥土种蔬菜。这是一个象征：副刊势难维持。很快我就奉召到农业组报到，被分配跑灾区了。

1961年年末，我在接龙山区接到总编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报社。回来袁总就找我谈话，严峻的形势就写在他的脸上，他紧蹙着双眉给我说：现在形势全面紧张，不止是物质紧张，更主要的是比例失调，引起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紧张。市委的口号仍是“继续大跃进，更上一层楼”，但有些话在一版二版上不好讲了，那就让副刊上来讲。还讲到，现在市民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更没有体育活动。副刊也要将“劳逸结合”的“逸”作为政策精神来体现，起某种晚报作用。等等。

袁总说的全面紧张，就是总路线这盘发条已紧得不能再紧，跃进螺丝钉再拧，受体就会破裂了。这时候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为救亡大会，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刻意维护三面红旗，绝不能让毛主席威望受损的宣传中，尽力从违背客观规律的领袖意志下脱围出来，以务实的调整，挽救国民经济于临崩之际，拯救民命于垂死之危。当时我虽然对大形势领会不深，但刚从灾区回来，也就有临危受命的感觉。回去和留在组上的同事陈国庆商量了一下版面设置，就根据袁总的谈话起草了一封约稿信，袁总阅了没有怎么改，就嘱总编室铅印，赶在春节前给副刊作者和通讯员发出去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回春之势，副刊工作也因此受到好评，袁总勉励我安心工作，说要提我当副刊组长，还评了我为年度先进工作者。但我却给报社领导写信“辞先进”，要求回文学岗位。我回文联后，王古泽才全面接了副刊工作，继后才有张黎群写《巴山漫话》的事。

文革是什么？就是党的领袖毛泽东要再折腾。经过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农村在解散食堂，重划自留地后，农民也走出饥馑，又能够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了。这样的艰难恢复中，更能板荡见忠臣，家贫识孝子。但毛主席对忠有自己的划线，在这形势复苏缓过气来之际，就表现了对极左政策的纠正不能容忍，认为是在刮“倒退风”，“黑暗风”，“翻案风”，在他身边暗藏着修正主义分子。于是就本着他大乱之后求大治的理念，步步设局，到文革发动炮打司令部，放出红卫兵造反，于自我失之后再求自我得之。置于这样的背景下作判识，1962年春《重庆日报》副刊的恢复和那封力求“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约稿信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整，也就是在劫难逃的事了。

现在我就把这封信披露出来（见附录），为重庆文革史补缺，关心这段公案的人，也就可以疑义相与析，从莫须有中析出荒谬之有了。



## 惊弦响处落哀禽 ——文革初期的文联大批判

不仅盲目，还迹近于疯。这就是文革初期文联中人在工作组主持下关起门来搞批判大混战时的情景。按江青所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文联中几乎无草不毒，无人不黑，纵不写文章，从所受过的文艺教育来说，也是吃封资修的黑奶而长大的。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是为了重组阶级队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面专政，被圈起来奉命挞伐的文联中人，也就一个个成了乌眼鸡，互抓互啄满嘴毛了。

群众的盲目和领导人的专断，是一言堂体制的构成所需，舍此就不能运转。大跃进发动之后，柯庆施说：“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李井泉在四川提出：“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就是深谙乾纲独断的精髓并强行贯彻时的要言妙道。总路线颁行后，毛主席经常为共产主义蓝图浮想联翩，原因在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各取所需”。几千年来中国百姓对“需”的要求卑微得很，就是养家活口。毛主席根据他掌握的信息，1958年就发出旷古之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多年在小农经济环境中冲杀，其实他是认为只要人吃饱之后，天公抖擞、百姓万马奔腾，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无奈经济规律并不那么遵循领袖意志，苦战复苦战，“粮帅”并未升帐，反闹到了连续几年大饥荒的“人相食”。于是毛主席只好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个漫天撒网般的检讨，说“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然后就退到了循名责实的地位，让一线的干部直接去为灾难负责。什么是毛主席匠心独运中想正之名，说出后又是全国全党必循之名呢？在1962年春夏，莫说乌狗般的百姓，就是在一线上苦干的中央领导人也不知道。1962年秋收后，又有得饭吃了，毛主席这才抛出了两个名：一为修正主义分子，一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循名责实进而揪人了。反修反走资派先从意识形态找突破口，毛主席1963年有条批示，就是直接针对文联和各协会来的。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就要吃饭，因而奉命批判是否违心，也就顾不得了。

文革初起时的批判混战，混中也有重点，主要指向就是1962年的调整。文联中先批我那封约稿信，继而批邓老均吾的《观人画柳》诗，就因为二者都表露了对政策调整的欢欣情绪，希望能促进形势的进一步好转。谁知经过大批判，竟发现那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产生了有悖于毛泽东路线的二心。论起罪来，我被打到“修”的层次，已够惨了；邓老因遭隔离，人不在批判现场，批判者颠倒敌我，故入人罪，更无忌惮。结果老共产党员邓均吾竟被推论到了蒋介石一方，说他1962年的回春之诗，是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诗人李伏伽（在批“三家村”时即挨整的）后来有文革词：“一夕风雷起上京，忽看碧海漫红尘，茫茫天意渺难明。周穆沙虫频历劫，祖龙兵火肆焚坑，惊弦响处落哀禽。”这也就是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写照。

化龙桥华村的美协四川分会，这嘉陵江畔的画家之村，因美协干部多调出参加工作组，一时竟有台风眼下般的安静，他们能逃得出“祖龙兵火”吗？在文联

发生《红岩》作者造反夺权后，我们几个中层干部按新生革命政权之命搞“红海洋”，成天爬在脚手架上涂“四个伟大”，就看到了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好不斗志昂扬，成天大唱“拿起笔做刀枪”，“混蛋王八蛋，叫你见阎王”，然后跺脚齐喊“杀杀杀”！在这样的杀声中，我们听到了冲砸美协的战斗动员，说那儿是“三名三高”的窝子，而且是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文革资反路线两罪并发，藏得有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于是我们就见到了闯将们挥动着铜头皮带呼啸而去；得胜后，又为了他们大砸黑窝子谈得眉飞色舞。美协原是文联中的一个协会，因为50年代前期的西南大区撤销才划归省美协，但与重庆文联同一党组。两边业务干部都是相熟的文友。这番冲砸，好像比文联的“惊弦响处落哀禽”还要惨烈，各种美术作品被格撕勿论，格烧勿论，有的画家还被揪了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牛文个子大，因当过工作组长，竟被踏上两只脚，也就是一个小将蹦到他的背上，踩得这个延安来的木刻家嗷嗷直叫……

我们成天为“四个伟大”刷红，却又实在不明天意。那时的两报一刊对红卫兵可是充满了蛊惑之词，说他们的造反每天都是“革命节日”！这样的节日，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中的那幅木刻插图：《断头机下的舞蹈》吗？“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公安六条”以及最新最高指示，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各种讲话，就是这样的“机器”和“绞索”。在“机”与“索”下，红卫兵在跳，各色造反头头在跳，文化乌狗们也跟着在跳——只不过他们常常会被推上台去，在绞索已套上了脖子的时候还要挣扎着喊万岁。可这样痉挛的疯狂的使人头足倒立之舞，我们竟然是一气跳了十年啊！

1976年，在“四人帮”仍在领舞，而文革妖风却日趋式微的情况下，美协的画家吴凡悄悄地创作了木刻《羽》：一个小女孩，赤足走进风暴肆虐后的花园，从泥地上小心拾取零落的但仍然好看的羽毛。这小女孩是谁呢？不就是木刻《蒲公英》中那个满溢着童心爱意的小姑娘吗！在文革大批判中，小姑娘所吹上天的蒲公英种子竟被批判为和平主义的种子、修正主义的种子，画家也被斗得来险以身殒啊！别来无恙，文革十年之后，小姑娘仍然天性淳良，仍然爱美，仍然关心着那些被狂风吓跑的会唱歌的鸟儿……虽然还没有中国版的《断头机下的舞蹈》被刻绘出来，但在四凶就擒之前，重庆画家就以木刻刀进行文革反思，已经是很难能的了。

由此观照文联，显然作家和编辑们所受到精神的戕伤与人格曲扭要更重一些。巴金在他《随感录》中所浩叹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已成积重阴霾，是文联上空迟迟不能消退的小气候。典型的表现就是邓均吾诗案。劫后私下交谈，谁都承认邓老人格高尚，诗品清醇，竟因一首颂春之诗打成“反革命”，真是诬之极矣。大批判时是“惊弦响处落哀禽”，谁也顾不得谁，到了雨霁云开之时，我们这些属下竟连拾取羽毛之类的事都不去做，不按照文联职分郑重提出为邓老诗案作昭雪，这是一种什么后遗症呢？在“祖龙兵火”横行之时，文人们必须穿上甲冑，殊不足怪，但从邓老诗案的平反难来看，是不是精神上的盔甲未卸，在不期

然中被“厚皮化”了呢？

呜呼哀哉，作为文联这个团体，尤堪哀者，是哀禽尚未尚殮。

## 不该回避的“病理切片” ——再谈《红岩》成书与罗广斌之死

《红岩》小说出版后，林默涵界定说：“这是党史小说。”罗、刘、杨总结创作经验时也说：《红岩》是地下党人前仆后继的斗争和烈士的鲜血所写成的。

这就清楚表明，《红岩》所反映的是一段历史，这部小说从成书说，更多的是政治的产物，集体的产物，是社会成果，而不完全是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属于作家的自由创作。文革前，重的是组织观念。若不能历史地认识文联作家中的各别情况，那就很容易认为，《红岩》有杨益言署名，他就是写手，刘德彬没有署名，那就不是。哪里知道，参加了创作劳动——甚至是主要劳动——而未予署名的事，文革前可是所在多有。

在组织支持下搞集体创作，越是强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这种方式也就用得越频繁。《红岩》这个创作集体，是重庆一解放就萌生着的，迄未中辍。因题材重大而给予鼎力支持的，先后有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后来有了《禁锢的世界》这样的初稿，这才从纪实之作转为文学创作，从而列上了重庆市文联和作协四川分会的繁荣创作计划中。

按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无论是作协四川分会和重庆文联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这一写作。一列入了创作计划，无异将一锭钢胚送入了加工成材的传送带上。而且在每一加工段中，都享受着“伯乐级”的待遇。在四川，是由沙汀、马识途这样的大师们给予帮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则有张羽、萧也牧这样的资深编辑，为他们精心打磨，甘作人梯。

小说于1962年出版，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物质匮乏时越要靠精神力量支撑。现在有了江姐、许云峰、成岗等英雄形象出来，全国景崇，进而就有了用各种文艺形式作改编的《红岩》热。

然而福兮祸所伏。毛主席多次讲过，为了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即使在党内夺回他认为不该旁落的权，也是如此。江青就是为此放出的哨兵。《红岩》影响大，就被她盯上了。因此召见作者，不仅派他们到文艺界反修整风中掺砂子。还传达毛主席的意旨：《红岩》要改，江姐不要死。

这样的宠幸有几个人能顶得住？何况罗、杨本就是在政工战线摸爬滚打的干部。当他们从北京回来向市委领导传达了“江青同志”指示之后，文联中的风闻者就颇困惑，窃窃私议。从作品传世要求来说，为了提高它的美学含蕴，社会价值，及至更加讲求作家的个性风格，文字特色，《红岩》当然可以改。但江青的指示却另有玄机，只为来头太大，也就只能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了。至于奉命者的罗广斌，杨益言是怎么理解的呢？当时所见，他们是已因这样的宠召显得身价不凡了；但也似有隐忧，因为说到底，他们写的是党的南方局到川东地下党的

那段历史。从江青批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即已看出，她是从路线斗争角度对这段党史持批判态度的，因而他们心不自安。更何况文革一起，既是文化革命，又是政治革命，过去支持他们从事创作的“组织”正被炮轰，他们该如何应变呢？于是出了声明，说他们写的地下党领导人和已经受到批判的“黑帮”萧泽宽无关，他们是根据刘少奇及其白区工作路线而进行创作的，殊不知这一说就把自己说来笼起了一——谁会想得到刘少奇会成为这次运动的头号打击目标呢？

文革要求每个人进什么门，举什么旗，鲜明表态。跟人跟对了，那就任你怎么干，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站错了队，那就休咎立现。于是就有《红岩》作者高举江青之旗，开始了他们狂飙般的造反之旅。

造反就有造反的逻辑。对于应召跳出造反的人来说，忽然之间，我们国家的党政财文大权，竟成了无主之鹿，谁逐到谁得，那还不是迷幻药、摇头丸吗？罗广斌在重庆带头造反之时，无论后来的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头头，都是对他尊之为“老前辈”的，但真一到了夺权阶段，那可就“亲不亲，权上分”。助我夺权者是哥们，妨我夺权者是寇讎。重庆一月夺权所建立的“革联会”，被称为“新生红色政权”，但照各路造反英雄看来，则是忠义堂前排座次，排对了就大秤分金，大碗吃肉，排得不好，那就投入“地煞”之列去啃骨头了。于是就有了聚义厅前大不义。罗广斌在此期间被揪和死于非命，也就成了“火并王伦”的现代版了。

作为一个案子，对罗广斌之死，在重庆已先后查过至少三回了。结论都一样，不存在他杀。但每次的调查结论都回避着或冲淡着一个问题：罗在文革中的造反与夺权。

毛主席批评过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可他老人家为实现其揪出暗藏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之愿，所作的指示却不惜绝对化，极端化，既唯心主义又形而上学。只要跟着他造反，“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一剂纯度极高的精神海洛因。罗广斌最后的绝笔是“给江青同志的汇报信”，题目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放在这个背景上来看他的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他杀”。

“党史作家”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是一个典型事例。在研究重庆文革史中，悲剧的肇因实在不该回避，至少也该作为珍贵的文革“病理切片”，长期而妥善地保存下来。

### **《红岩》作者去渣滓洞造反**

1966年11月27日，重庆大田湾广场的群众集会，罗广斌、杨益言绕场接受万众欢呼，在会上作主旨报告，以大会名义通过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等决议，是他们两人造反生涯的辉煌顶峰。在此之前，还有一次与万人大会互为表里的事，知道的人却不多，也值得一说，那就是《红岩》作者杨益言去渣滓洞造反。

白公馆与渣滓洞，是军统集中营的两大监狱。11·27大屠杀，也就是蒋介石

石政权在重庆溃逃前的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将屠杀现场办陈列馆，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等出狱人，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定什么馆名，突出什么思想，直至解说词的审定，馆方对他们的意见从来都很重视，甚至是言听计从——本来老照片上渣滓洞的围墙没有铁丝网，访问在劳改中的原渣滓洞看守，也说没有，但是杨益言一口咬定说有，也就按他说的做上了。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去造反呢？说来只为文革发生后形势变了，正如写作要为政治服务一样，展览陈列也必须为造反后的政治服务。

于是，就在重庆文联文革小组成立后的11月上旬，杨益言坐了部宣传车，带了哈军工“鬼见愁”等红卫兵小将，响着大喇叭，杀气腾腾地开到渣滓洞去了。被召来听取“勒令”的，有文化局副局长、老红军朱鼎固、社会文化科长郭修真等干部。杨益言首先点着老红军说：“老朱呀，你是有罪的，你根本不配当文化局副局长，你忘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他的具体意见，就是这个“美蒋特务罪行展览馆”根本无须搞什么总馆，搞了也要拆掉；只需要突出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处牢房就行了。怎么突出？他可是有革命性的改造方案的：那就是仿照着大邑县地主庄园的大型泥塑《收租院》，也要在渣滓洞监狱搞反映革命志士狱中斗争的大型泥塑。每个牢房都要选取革命烈士或脱险志士，在众多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连起来就是一个长廊。每牢房的泥塑都要有情节性主题，如狱中志士学毛主席著作，要有画外音，反映难友们想念毛主席时，狱内幕墙上就要出现金光闪闪的伟大领袖形象。

事后曾听朱局长说，尽管杨益言这么申饬他，造反派脾气嘛，听着就是，对他提的改造意见——在牢房中搞泥塑，倒是认为富有创意，应该接受。但一具体到这组大型泥塑该塑什么人？取什么情节？为了增强展出效应，对牢房又必须作怎样的改造？他们就疑虑重重，叫苦不迭。比如杨益言讲叶挺将军就在渣滓洞男牢房二室关过，这儿也就是他写《囚歌》时的“六面碰壁”之居，怎么办呢？因为渣滓洞关的囚犯属士兵待遇，吃糙米；白公馆囚禁人士社会地位高一些，吃甑子饭，属尉官待遇。而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他关在这个军统特区中的一处独院——红炉厂五福临门院子，他可以养兔，会见家人，还可于邮检后发信，《囚歌》就是他寄与郭沫若才流传于世的。照杨益言的说法，叶挺竟然在渣滓洞和他先后“同牢”，那怎么向观众解说呢？再如为增强泥塑效果而进行的牢房改造，也使他们暗搔头皮。比如，杨益言坚持要把现有的渣滓洞男牢房拆了，改矮一些，采光的天窗也要改方向，不是原有的在后面，而是更便于参观展览的在前面。朱局长说，特务火烧渣滓洞并未烧完，又有当时的照片，他们是根据原有的断墙残垣整旧如旧的。从营建房子说，天窗也应当在后面。杨益言的回答是：“按道理说这房子天窗应在后面，但是美蒋反动派都是反起行事的，（天窗）一定要搞到前头。”

至于渣滓洞牢狱的外环境，如哪儿有特务哨楼，哪儿有铁丝网，杨益言虽只在这儿关过半年，他说如此，照办就是了。然而围墙出现的一处缺口，就很考人。这个缺口是在大屠杀发生前就被雨淋垮的，特务并没有把它补起来。11·27

大屠杀之夜，未死的志士就是从死人堆中冲出来，从这个缺口处往外逃跑的，其中就有刘德彬、萧钟鼎等人。可杨益言坚持要把坍缺处恢复，说是越狱志士是推倒了这面墙，英勇地在机枪扫射中胜利越狱的。可刘德彬等脱险志士有回忆录，解放初期还拍过新闻记录片，还有突围者牺牲在墙缺处的照片。狱墙为越狱志士推倒之说，雄则雄矣，但怎么讲得圆呢？杨益言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只要越狱同志冲出去时脚上沾了些灰，就可以说成是推倒的！”当时的陈列现场是，狱墙已经恢复，坍缺处用虚线标出，说明词完全按照《美蒋特务罪行实录》所说：“缺口是11·27前两天被雨冲塌，11·27志士们由此冲出。”杨益言就前往煽动说：“这是完全歪曲烈士斗争事迹。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的烈士用高墙囚禁在里面，1949年解放前夕，革命先烈冲出牢房，推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囚禁革命先烈的高墙。而现在黑市委又修起了高墙，这些混蛋还企图把我们囚禁在这里头，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造这些混蛋的反！我们要把这高墙推倒！”

于是轰然一声，灰雾腾起，这处狱墙就在杨益言的指挥下，被应召前来的造反者推倒了。

这是杨益言的一次造反脾气大喷发，再何况几天后有大田湾集会的召开，通过了将重庆市改红岩市、将“11·27烈士”改称“红岩烈士”（此议近年已经得到兑现）的倡议。杨益言要将“一点灰”说成是“一堵墙”那也只能照办。市政府就由秘书长林蒙出面，请杨益言参加，看对他们的改造要求如何落实。杨挟造反声威而来，他的改造方案成了严令：黑市委和政府必须在11月30日前就开始动工，除泥塑需要请雕塑家设计和由他们参予审定外，其余对两处监狱的内环境和外环境改建，都必须限期于1967年4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杨益言这些很让“黑市委”及有关部门头疼的要求，被瞬息万变的文革形势打断了。“一二·四”事件发生了，一月大夺权发生了。罗广斌自杀后杨益言逃往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找路子求见江青去了。白公馆、渣滓洞的改造方案也就搁置起来，也就使得林蒙秘书长和老红军朱鼎固们，从“限期完工”的苦恼中解脱出来。

文革是结束了，然而陈列必须为什么什么服务却并未结束。只不过过去主要听命于上，文革中一度听命于造反派，现在则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暗中指挥。磁器口古镇为开发旅游资源，就在不知哪些高参的策划下出现了这样几处“红色景点”：先是有了由杨益言题匾的“韩子栋（华子良原型）陈列室”；再是临街办了个杂货店，门前钉有“地下党联络处”的铭牌，还塑了个前来接头的华子良的铜像；再是临江石壁上凿有大字：“华子良脱险处”——把小说《红岩》中虚构的内容形象化、“遗址化”了，构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系列“红色景点”。这就明显带得有杨益言的鲜明印记以及今天的市场印记了。

## 从武化到兽化 ——文革中的夺权与夺夺权

造反是狂，造反夺权是疯狂。重庆和全国一样，因为夺权过程中的权重权轻，利大利小，很快就入主出奴，有我无你，分成了好派与屁派，支派与砸派，打起来了。权权权，命相联，夺权与再夺权，再再夺权，很快就全面内战，势如丛林野火，短时间里就由弹弓石头阶段上升到钢钎大刀、白刃相交，再就是真枪实弹。重庆是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也就有了冲锋枪、四联高射机枪、三七高射炮……乃至军舰、坦克也出现在为权而战的相互屠戮中了。

重庆市文联所在的两路口，是入城的咽喉，也就是为夺权而战的两派必争之地。经过几番搏杀，终于沦为一派控制的所谓“解放区”，文联恰在这个区的中心地，于是就有了造反军总部的进驻，有“雄狮”“猛虎”等武斗队的扎营，文联因此成了武联。文化人也就只能将妇携雏、五流四散，成了文革中的难民。

我爱人在重庆卫校教书，卫校所在的袁家岗地区，两派冲突甚烈，于是就有了火烧弯弯大楼，沿途的水泥电杆被炮弹轰来横起。所幸卫校有个分部在城内仁爱堂，地处南纪门的高岩之上。卫校职工才有了逃难地。文联的一些干部也就托庇入住，苟全一时。仁爱堂地势较高，我们也就看到了“造反舰队”溯江而上，走一路扫射一路。入夜，解放碑附近的高楼上有探照灯扫射，然后喇叭响起：“×派崽儿，硬是不听招呼嗦？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话音一落，就是激烈的枪声响起。喇叭又吼：“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枪声一响，老子就死在战场上了！”话音一落，必有“冲呀杀呀”的呐喊声响起。若战区的老百姓被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人命如蚁，人命如草；造反武装连解放军运粮运煤的军车都敢打，何在乎几条民命。汇报上去，江青听了无非说“小青年爱玩枪”。林彪则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文革仍因“全国一片红”的伟绩而颂歌入云。

重庆武斗中，若是捉住对方俘虏，甚至只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凌辱方法甚多，最显兽性的就是“放气放血下零件”。“下零件”者，割耳朵也，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献馘吧。若是武斗中自己一方死了人呢？只要掌着权，可是不吝为死者修墓，封为“烈士”，以激励更多的人为我派政权而战。宜宾就有这样的“烈士墓”，在翠屏山上——也就是赵一曼纪念馆后面的一座山头。泸县也有这样的墓群，因系专区派斗中弱势一方，死人更多，丛葬墓莹一排排圈山而上，直至山顶。无论是重庆、宜宾或泸县的所谓“烈士墓”，都有着共同的标帜，那就是语录碑和诗词碑，凡有武斗死者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镌刻于石的金光闪闪的毛语录毛诗词。

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这妖魅昼行，屠戮百姓的文革，终于在爆发了天怒人忿的1976年被结束。当年乱川的祸首们，或则坐牢，或则自绝，受到了人民的正义惩处。然而人们在救治疮痍中，并没有注意留下社会的“病理标本”，比如四川各地的“烈士墓”，大多被毁，仅存的也就在任其自灭中沦为荒烟野蔓、走磷飞萤之地。墓前的语录碑诗词碑也被时光汰洗了。如此，重庆沙坪坝区能将一处武斗死者的丛葬残留地作为“地方文物”保存下来，从为浩劫留物证说，各

方都赞成。我尤其希望能成为巴金生前所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种起步。

巴金提出“文革博物馆”设想时，讲到了两种“不要忘记”：一是受尽了血与火磨炼的人们不要沉默，不要忘记文革中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防止“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再有一种“不能忘记”，就是仍然有人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大革命”。

两种“不要忘记”，就反映着“劫”和“节”的两种历史观。对千千万万的受难者来说，文革是非人之劫。但对于曾经炫赫过一时的某些人来说，文革则是昙花一现的狂欢之节。

且让我抄两段作家王蒙讲过的话吧。一是关于“忘却”——

“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及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

如果忘记的是历史呢？王蒙又讲了——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一个颠覆的因子，一个震源了。”

### “群众整党”中的日记案

“群众整党”是文革中、后期的一种造反性吐纳，为把文革成果落实于组织上，“造反不当官，等于白毳干；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另方面呢？根据“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之说，很多人过不了关。我在文革中既有“约稿信”的前科，又因日记被抄，从中梳出了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当然更在关口处卡着。

焦点在1962年的一篇日记上。把关者要我交代的，不在纲而在目。说上纲检讨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文联的人都会这样干；重点是要我把日记上所发的感慨，必须竹筒倒豆子般的一一说出。我明白，这样的吐实，也就是罪行坐实，很可能就此被当成“故”来“吐”了，于是只好想办法绕，检讨了一个月“群众”都不满意，被认为不适合在经过文革洗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登记，就这么挂起来了。

现在自然是可以吐实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我作为党报中的记者，可以说目击了总路线在重庆地区实施的全过程，看到许多“动人场景”。谈开了会收不住口，那还是以日记为限，谈几件当年把关者叮住不放的事吧。

“把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国富、包括民财，都给吃光、烧光、种光了。”这是我日记中被认为最为反动的话：公然攻击党的大跃进是实行“三光政策”，这还了得！一定要我说清何为吃光？又何为烧光与种光？逼我作具体交代，无非是要把我往彭德怀那边送就是了。现在挂一漏万地作回顾：

所谓烧光，至少包括为办公共食堂缺乏硬头柴而拆房子，为夜战而将豆棚瓜架的竹竿木桩给点了大火。最主要的燎源之炬是大炼钢铁。炼钢的流程和生产目的，本是矿化成铁，铁炼成钢，钢浇成锭，锭轧成材，材做成器，然后运到它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可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则是倒过来，将各种已经制成



的铁器——农户的锅收了，庙上的钟砸了，建筑物上的金属部件撬了，然后砸碎放入坩锅，去溶，去吹。炼的方式则有煨钢、焖钢、炒钢、燉钢等等。报社各专业组都作过这样的报道。今天想起来，这样的煨炒焖燉放“卫星”，真是全民动员在办儿戏的姑姑筵、锅锅肴、家家酒啊！

坩锅炼钢很快上升为小高炉炼钢。我们见到的小高炉群在巴县文石槽，因为槽狭而长，砌了高炉，正好便于将两边的树料和“恍子石”（我去那儿采访，农民对我说的就是‘恍子石’而非矿石）往下倒，白日烟雾缭绕，夜来火烧连营，甚是壮观。因此产生了一组民歌联唱，定场诗四句：“说起你不信，干劲大得很，喊声山让路，只见石头滚。”——坦白交代，这所谓“民歌”其实是我在现场编的。有一天，有人兴奋地通知我：“记者快去看，炼出了一块大钢！”我赶到了指挥部，确实见到了一大块焦锅巴似的大钢，中间用铁丝穿了，由两个大汉用长杠子抬着，向指挥部报喜。在读喜报过程中，就见渣块不断下掉，读完把“大钢”一放，就砸地碎成几块，但这丝毫不影响当天出红榜。

文石槽还在折腾中，新花样又出来了，叫“炮楼炼钢”。原来巴县山区的地主院落旁，常修得有炮楼，样子和小高炉差不多，但容量更大。于是就把楼板锯了，倒些树料、焦炭和矿石进去，估计应该放出大一些的“卫星”，可我还没有去观胜就听说炮楼烧爆了，钢没有刨得出来。不过不用丧气，还有更上游的敢想敢干出来了，那就是“埝塘炼钢”，也就是利用山垭处的干埝塘，把塘底略作淘整，就倒入树棒和恍子石，然后覆而烧之。这样炼得出钢吗？反正《重庆日报》的记者思想解放不够，我只知道有“炮楼炼钢”与“埝塘炼钢”，没有见到出钢的报道。但广西省就上游得厉害了，他们创造出了“山谷炼钢”，因而大放“卫星”。消息可是在堂堂《人民日报》上发出来的。

再说点吃光吧。1958年，南岸涂山公社和市粮食局合办公共食堂现场会，目的在宣传社员不仅能敞开肚子吃饭，还吃得好。到会者吃了两个多小时，主办方宣布：不忙下席，还有几道主副食品没有上啊！有的人就跑到猪圈屋去，用鸡毛扫喉的方式催吐，然后回到席上再吃。记者生涯有个说法，叫“要玩许多格，也要遭很多孽”。两年后我到巴县栋青公社采访，公社书记对我说，已安排我午间去小学搭伙，这样吃得饱些。我去了，就和校长教师一道围着一堆渣渣草草作清理，原来学校开展了“一人一把草运动”，小学职工则把这些青草搜理一遍，洗净切碎，等米粉开锅之后就倾倒下去。那天我就吃了一大瓢，说不上遭孽，真正遭孽是我在日记中把这事提到了，因此对我批之又批。

还有一句“‘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胡涂症”。也是我日记中被认为是最具反动性的话。一定要我说什么叫“三六九”？什么人害了“胡涂症”？对于这样的追逼，我倒是作了如实交代的，但时间已是“四人帮”就擒，重庆文联又办了《红岩》文学双月刊的时候。我写了篇杂文，叫《向空绣套掷一投枪——重提“三六九”》。我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六二年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达后，一时被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又被一连串的反“右倾”斗争和强迫命令风弄得相当僵化的政治局面，根据毛主席“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指示，本着新颁布的“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的原则，逐步地在趋于活跃。

正是在总结“五风”教训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八股”调

“虽有三年灾荒，但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即有缺点也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云云，云云。

时人讥诮，称之为“三六九”。

.....

然而，将一床绣了“三六九”图案的锦被一祭，一切就都包容起来，党的“八大”决议被公然违反，无从提起了；“一平二调”的为害及其症结，找不到了；几亿人的痛苦和呻吟听不见了；我们工作中的是非，正确和错误分不出了。剩下的就是混乱的政治术语，蒙人的混元口袋，揉包包散只图娃娃不哭的婆婆经。正是在这种烟幕中，陈伯达、张春桥一类骗子及其煽起的极左狂风，得以从容遁去。

从实质上看，“三六九”和横恣一时的“五风”是一路货，是“浮夸风”在其退却时的一个变种。

说轻微一些，它也是“五风”的掩体，是东郭先生让狼躲藏起来的斯文口袋。

何况，就是在号召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的一九六二年中，“五风”也并没有真正收敛。这一年还没有过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尚未普遍与干群见面，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才在开始复苏，它就从“三六九”号防空洞中钻了出来，披上一件“大抓阶级斗争”的新法衣，又来大乱中华了！

这样的交代可就有点下棋时“将军”的性质了。《红岩》编辑部中谁看过？什么态度？我一概不问，估计是一粒石子丢入沼泽，泡都不会冒一个的。当时我也是编辑，若让我今天在这篇杂文的审稿签上签意见，撇开意气成分，我要如实说：“有所破题，但把这味‘药’只说到陈伯达与张春桥，就杂文的骨鲠性来说，还是缺钙，可不用。”

## 附录

### 1962年春节《重庆日报》副刊约稿信

——同志：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不久，农历壬寅年的春节又将到来。我们在此恭贺你新年快乐，春节快乐，并预祝你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绩。

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关键的一年。在这万象更新，冬去春来的时候，正是人们想想过去，看看未来，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提出新的进军目标的时候；正是人们总结经验，鼓足更大干劲，开始新的行程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作者同志

拿起笔杆，大写特写的好时候；我们应该写一写人们为当前生产紧张的劳动，应该写一写人们为明春做好的充分准备，写一写开年战斗中到处开门见喜，朝气蓬勃的兴旺气象；写一写我们生活中新人新事新风格，写一写人们在过去的一年和大跃进以来，怎样鲜明地举起三面红旗，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副刊对稿件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在一段时期的宣传中，仍要求来稿大体上围绕着一一定的中心，体现一定的思想。在当前我们认为可以围绕以下几点做文章。

1、宣传人们永远鼓足干劲，永远力争上游，永远做促进派，永远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2、宣传全局观点，整体观念，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3、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工农联盟、城乡互助的思想；

4、宣传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5、宣传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中，山城文化艺术方面的新成就、新气象和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为了把今年的副刊办得更活跃、更新颖、更有战斗性，在编辑工作上，我们有这样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和作者同志们商量商量，希望能听取你们的意见和得到你们的热忱支持。

1、新的一年要求全党全民树雄心、立大志，在党中央和国家统一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工作，鼓足干劲，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胜利而斗争。为了百倍地加强党和人民的战斗力量，今年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因此，我们把对短文的组织，当成今春副刊工作的首务。我们希望作者同志们精心研读人民日报社论《新年献词》，《红旗》社论《鼓足干劲，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本报元旦社论，围绕我们所提的几点中心，结合你生产、工作、生活、学习所接触到的群众思想动态，积极撰写社会思想评论一类的“小块文章”，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取材上是海阔天空，一花一叶均可入文，体裁上更是大可以随便的。可以是带理论色彩的短论短评（如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剖析“实用主义”，“协作如何作”“精雕细刻的作群众工作”，等等），更可以是文学色彩浓郁的小品杂文（如提倡干“粗活”、当“傻子”；担重担，爬高山；颂扬烈火真金，疾风劲草；赞颂云水襟怀，松柏气节；表彰愚公精神，延安作风；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岁寒见精神的松、竹、梅，乃至帮助读者划清思想界限的“释笨”、“什么是聪明”、什么算“吃亏”等等）。欢迎就自己生活实感或对报上发表的好风格好思想，作进一步联想阐发的随感杂录；也欢迎读书话旧，借古喻今，举一反三的偶记漫抄。欢迎正面歌颂的抒情性短文或就某一点具体感受发议论的“星火集”“鼓点篇”，也欢迎就某些时弊作批评建议的“大家谈”，乃至寓言漫画、格言谚语、语丝话片，两语三言。总之，只要确实有动於衷，言之有物，深入浅出，短小精悍，不论长枪匕首，我们都无不欢迎的。

2、用各种文艺形式（小说、诗歌、特写、唱词）宣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好思想好风格，让“人”——社会主义新人——在我们报纸上活跃起来。继全市

的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后，全省也将在今春召开工农业方面的劳模会。各地的评选代表、插红旗、立标兵等活动，是值得我们作者同志热情关怀，积极采写的。若是写典型人物的报告文学，可以不必求全，只要能真正的见人见心，展出他的精神面貌，思想风格，抓住写出一二感人至深的事迹就好了。

3、今年的2月4日（星期日）是农历辛丑除夕，又逢立春。立春的第二日，就是壬寅年春节了。佳节难逢，从立春日起，我们打算在副刊上辟一个“春”的专栏，以后逐期发一至二篇。在千方百计争取农业丰产，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的新的关键的一年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是既有雄心壮志，又是脚踏实地的在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到处热气腾腾，生意葱茏，春的脚步无处不在。为此，我们希望作者同志们热情吹响春的号角，大唱“迎春曲”，把春天吵醒，让万物“惊蛰”。春在人们心中，春在各个战线上行进，因此，不但是在农村工作或劳动的同志可以大做文章，工矿、学校、商店、部队、机关的同志都可以就这题目放笔泼墨。用散文、用诗歌、用画图 and 摄影艺术作品，来写你生活中的大好春光、歌颂实现开门红的“春燕”和“催春鼓手”，抒发群众人勤春早的生产干劲和决心让春光永驻的胜利信心。这个栏目究竟叫“春的脚步”“春的号角”或者是“迎春之歌”“催春战鼓”，我们还没有最后定案，希望你在写稿同时，也给我们出个主意吧！

4、去年，副刊结合各个节日和时机，组织刊发了一些革命回忆录等文章，对读者进行传统教育，收到了一些好的反映。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我们先人的艰苦作风。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应该永远提到它，让它一代又一代地在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我们副刊编辑工作中的一个经常性任务。这方面的题材也非常广泛，体裁也可以多种多样的，革命故事，文物介绍，遗篇重温，地方革命史料和对先烈生辰忌时的悼念回忆，都可以像春播秋种那样，结合相宜时机细水长流的作下去。试以这两月为例：1月21日是列宁逝世纪念日，1月28日是“一·二八”上海抗日的三十周年，2月7日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纪念日，2月10日的较场口事件和继后的沧白堂事件，2月21日，反殖民主义制度斗争日；2月22日，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十六年；2月17日，巴甫洛夫的忌辰；2月28日，台湾人民反蒋示威的“二二八”事件十五周年，等等。结合这些日子，给我们青年同志讲故事，话当年，谈学习，说修养，写出打动人心的好文章，既是我们副刊，也是整个革命事业所需要的。

5、关于文化艺术方面，我们希望今春更加东风浩荡，日照煦和，百花盛开，春光如锦。为此，在文化艺术活动方面的评述和报道上，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打破框框条条。市文化俱乐部的开办，得到文化界的广泛欢迎，我们也就想在副刊上，增辟一个“文化茶座”（暂名），——举凡影评剧谈、品诗赏画、写作通讯、艺术探讨、提倡表扬、批评建议，都可以不拘一格，乘兴写来。“文化走廊”也将把报道面进一步拓宽，力求把山城文化艺术界活动的生动活泼，广泛多面，有图有文的报道出来。这里，特别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茶座”，议论风生，都来当

“催花使者”。

一年伊始，瞻望前景，无限光明，深感要作的事很多。春光可贵，就此打住。总之，希望你举笔添干劲，奋发迎新春，在新的一年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殷切的盼望着你的新作。

---

## 【编读往来】

### 阎长贵谈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

看了 10 期上有关民间资料的几篇，很高兴有这么多人关注文革小报、传单这类民间资料的研究。文革是裹挟全民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革研究，即客观全面反映文革的历史，决不是哪个英雄好汉所能单独完成的，它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很大集体的事业。现在虽然禁令多多，还是有很多热心人在从事的，从贵刊所发表的文章即可看到。吾等七八十的人，显得老迈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和你们一起做点事情。

### 杜钧福建议对民间资料的整理提出分类方案

上期“民间资料专辑”中李晓航一文所报道金大陆、金光耀他们的工作很好，我想建议，最好能以他们的经验，提出一个文革资料整理的分类方案的草案来，供大家参考讨论。因为不久前有文革资料搜集者向我咨询，是按事件分类还是按地区单位分类更好？如果大家能遵循一种分类法，对今后资料的交流、使用就能提供方便。

### 作者黄肇炎来信作一更正

上期发表拙文《文革中一家独具特色的油印小报》后，经黄顺义同学设法联系上了文中提到的当事人之一李志君（文革时改名李闯），得知他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不是文中说的兵器部昆明物理研究所）。后调往四川省地震局，任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特作更正。